

慈運理

瑞士的宗教改革領袖慈運理(Ulrich Zwingli, 1484-1531)，父親是薄有資產的農民，是鄉村的地方首長。他生在1484年一月一日，比馬丁路德只晚不到兩個月。

1498年，慈運理入維也納大學，後轉巴塞大學，於1504年畢業；1506年，繼續完成碩士學位(M.A.)。受到神學教授維敦巴克(Thomas Wyttenbach)的影響，接受按立，成為歌拉路(Glarus)的教區神甫。

慈運理喜愛古典文學，又好音樂。

他性喜和平，特別反對瑞士以英勇有名的雇佣兵；但那時的瑞士，剛於1499年獨立，出產不豐，比較貧窮，雇佣兵是重要的收入。不過，慈運理以為那與基督徒的信仰違背，並將造成敗壞的文化，應該予以禁止。因此，在1515年，他寫了一本諷刺文體的書何去何從(*The Labyrinth*)，指出基督徒應該有兄弟的友愛，棄絕暴力。但歌拉路傾向法國，多以作法國雇佣兵為業，對他不滿，導致他結束了在那裏八九年的牧者，而改往愛恩塞頓(Einsiedeln)。

在1515年，慈運理結識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 1466-1536)，對那位大他十八歲的著名人文學者，終生極為傾佩。

1516年，伊拉斯謨譯希臘文新約(*Novum Instrumentum*)出版，極受學者和教職人員歡迎，慈運理自然也深受影響。他接受聖經為真理最高標準，盡心研讀，並親手抄寫成一小冊，隨身攜帶閱讀，直到能夠背誦其中大部經文。他也看出羅馬的腐敗和背道，著意教會改革。

1518年，慈運理受邀往蘇黎克(Grossmunster, zurich)大教堂的牧者。那時，他正當盛年，口才能力，都在巔峰狀態，會眾深為歡迎。

次年，他在那裏開始一系列的新約講章，開釋經講道的新紀元。那年八月，黑死病瘟疫在城中流行。許多人逃出避疫。慈運理正在礦泉地區度假。他因工作過勞，健康不佳。但他為盡到牧者的責任，不計自己的衰弱，立即返回城中，去探視安慰病患，看顧死者遺下的孤兒寡婦。結果，他自己也感染上疫病，接近死亡邊緣。三個月之後，才漸漸恢復。

慈運理寫了一首“瘟疫詩歌”：前四節是作於初患病的階段；中段五至八節，是病漸沉重的時候；末後四節，是於恢復後完成。

主啊，幫助我，
我的力量和磐石；
聽，就在門外，有
死亡叩門的聲音。

伸出你的臂膀，
曾經為我受過傷，
也征服過死亡，
求使我自由。

不過，如果你的聲音，

在這生命的中天，
要呼召我的靈魂，
我也順從甘願。

以信心和盼望
我不再戀此塵世，
天堂確實屬我，
因為我已屬於你。

我的病痛加深；
快來安慰施恩；
因為危難和懼怕
攫取我身體靈魂。

死亡已在身邊，
我的感覺失靈；
我的舌頭麻痹無聲；
現在，基督，你得勝。

看哪，撒但在用力
來奪取它的擄物；
我覺得它的抓緊；
我豈能任它去？

它不能傷害我，
我不為損失懼怕，
因為我躺臥在
你的十字架下。

我的神！我的主！
你的手施行醫治，
在這地面上
我再次得以站起。

不能再讓罪惡
掌權在我身上；
我的口舌只要
完全為你歌唱。

我的時間將到
雖然現在遲延，
也許，還要經過
更深長的幽暗。

但是，讓它來吧；

我要歡樂上升，
並且負我的軛
一直到達天庭。

Help me, O Lord,
My strength and rock;
Lo, at the door
I hear death's knock.

Uplift thine arm,
Once pierced for me,
That conquered death,
And set me free.

Yet, if thy voice,
In life's midday,
Recalls my soul,
Then I obey.

In faith and hope
Earth I resign,
Secure of heaven,
For I am Thine.

My pains increase;
Haste to console;
For fear and woe
Seize body and soul.

Death is at hand,
My senses fail,
My tongue is dumb;
Now, Christ, prevail.

Lo! Satan strains
To snatch his prey;
I feel his grasp;
Must I give way?

He harms me not,
I fear no loss,
For here I lie
Beneath thy cross.

My God! My Lord!
Healed by thy hand,
Upon the earth
Once more I stand.

Let sin no more
Rule over me;
My mouth shall sing
Alone to thee.

Though now delayed
My hour will come,
Involved, perchance,
In deeper gloom.

But, let it come;
With joy I'll rise,
And bear my yoke
Straight to the skies.

這次經過死蔭幽谷的經驗，使他的靈性提升，也有了深度和闊度，使他體會到信仰不僅是個人的事，也與社會有關；他以為人民靈性的情況，正如他自己一樣，染上了不治之症；只有基督的死與復活，不僅為個人的救恩，也建立了教會。

恢復後的慈運理，更有能力的踏上講壇。1920年，得到議會的支持，他宣講“真正神聖的聖經”，預備蘇黎克反對禁食和教職人員的獨身，開始了瑞士的宗教改革運動。

1522年，慈運理和十位神甫，聯名向教區請求准許自由結婚，未獲批准；慈運理與一寡婦安娜(Anna Reinhart)秘密結婚。二年後，才舉行公開婚禮。

蘇黎克宗教改革的關鍵，是1523年，蘇黎克議會主持教義辯論。慈運理訂了六十七條，邀請歐洲各地和瑞士的教職人員參與辯論。同年十月，又再舉行第二次的辯論。結果，多數贊成通過廢除彌撒，於復活節起，代以簡單的聖餐；清除“聖像”；聚會停止使用風琴；並於座堂學校增設神學院，訓練教職人員。另一項重要決定，是著手翻譯蘇黎克德文的聖經。

1528年，慈運理應邀至相鄰的城邦波恩(Berne)，參與教會體制和禮儀的辯論。結果，波恩通過廢除彌撒，聖像，和祭壇。慈運理的年輕同工柏令格(Henry Bullinger, 1504-1575)，當時也同參與辯論，他提出正式條文，作為改革的原則：1. 教會是由神的話而生，基督是唯一的元首；2. 只有在合乎聖經之下，教會的法規才為有效；3. 基督是稱義的唯一根源；4. 聖經並沒有教導聖餐的餅和酒有基督的體質同在；5. 彌撒是全然虛假的基督受死表演；6. 死去的人代禱，煉獄的教訓，及聖像和圖像，都沒有聖經的根據；7. 所有信徒可以自由合法的結婚。在這根基上，蘇黎克，巴瑟

和波恩等邦，共同組成了“基督徒聯盟”(Christian Civic League)，成為同一信仰的聯邦。

1529年，慈運理至瑪爾堡(Marburg)，與路德討論教會體制上的意見。那是腓力王子(Philip Landgrave of Hesse)為了策畫改革運動聯盟而促成的。在他的城堡內，進行了四天的對話，在十四項信仰問題上達成協議；只在聖餐解釋上意見相違。馬丁路德堅決的不承認羅馬天主教流傳的“化質說”(Transsubstantiation)，但堅持基督在設立聖餐時說“這是我的身體”(太二六：26)，應該按字面領受；他把這句話用粉筆寫在桌面上，並反復引用。這主張後來稱為“合質說”(Consubstantiation)；意思是說：經過祝謝後，在領受的時候，聖餐的餅與酒，有同質性的同在。慈運理則以為這句話中的“是”字，應該作“象徵”解釋；否則主也說過祂“是羊的門”，“是葡萄樹”，如此解釋豈非可笑？因此，他一再引用主所說：“叫人活的乃是靈，肉體是無益的”(約六：63)，對話難以達成公識而散，否則宗教改革和以後歐洲的形勢，將大有不同。

1531年，瑞士的改革各邦，與決定追隨羅馬天主教的各邦，發生戰爭(Kappel War)，慈運理為蘇黎克的首牧，戎裝參加，於十月十一日，受重傷，終於死亡。

二十七歲的柏令格，繼任領導改革運動，建立在慈運理的根基上，繼續成長並擴展。

科門尼

一種最成功的世界語，“愛思不濫讀”(*Esperanto*)，是於 1887 年，一個波蘭眼科醫生 Ludwik Zamenhof 發明的，目的是成為一種人工的國際語言，以增進共同了解和平。因為他是猶太裔俄國人，生在波蘭和俄國邊界上，受了種族歧視，於是，他盡力推動容忍，以為國際語言的溝通，培養世界性的廣闊襟懷。他以 *Doktoro Esperanto* 的筆名，出版了一本歷史性的書 *Lingvo Internacia*，成為世界語運動的開始。以後，他翻譯了許多書，包括舊約聖經，莎士比亞的漢姆雷特王子，及安徒生的童話等，成為世界語。

早在十七世紀，一個畢生受宗教迫害的難民，也能有如此襟懷和遠見，則更為難能可貴了。

胡司(Jan Hus, 1373-1415)在波希米亞的宗教改革理想，使他自己成為殉道士。羅馬在康士坦市(Constance)的火焰，並沒有把改革信仰燒滅。胡司的跟從者，由抗議而抗爭，持續了許多年，終於被羅馬帝國的勢力弭平。但那只是由城市而轉移到鄉村。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再次挑旺了捷克人的改革信念。不過，三十年戰爭進入了十七世紀，1618 年，波希米亞興起了英勇的反抗戰爭，仍然是以失望收場。

但是，正如伊拉斯謨說的：“信仰不能以刀劍決定。”有一個人更積極的相信：信仰必須以思想決定；而決定思想的是教育。這人是科門尼(Jan Amos Comenius, 1592-1670)。

科門尼生在東莫拉維亞(East Moravia, 今捷克)。十二歲的時候，父母亡故，他被送到普萊洛府(Prerov)受教育。他愛學習；但那裏的教育方法，使他非常難受。幸而校長認識他的天才，鼓勵他進入教職事奉。

1614 年，在海德堡大學(University of Heidelberg)畢業。二年後，受按立，在滋拉邑(Zeravice)的聯合弟兄教會任職。兩年後，任福勒耐(Fulnek)的牧師。

羅馬帝國皇帝費迪南二世(Ferdinand II)，決心要使波希米亞徹底天主教化。改革信仰的領袖們，在戰爭中失敗逃亡。科門尼也不得不隱藏起來。在 1620 至 1627 年，那段黑暗的時期，他寫了世界迷局和內心的樂園(*The Labyrinth of the World and the Paradise of the Heart*)，那是一本像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的寓言書。書中的基督對尋求知識的“天路客”說：

“學問的最高峰，是在我所有的工作上尋求我，看何等奇妙的我統管你和萬有... 不過，你尋求一切學問，必須不是為討別人歡喜，而是要更親近我。”

這表明科門尼的基本信念：科學知識與宗教信仰，不是相反的，而是有其共同目標。在基督裏，有內心的自由和平安。

1628年一月，情勢的發展，使他決定離開本土；一班同一心志的信徒，隨他同行。當他們臨近波蘭邊界的時候，科門尼領大家作禱告：望著這冰封雪掩的大地，他求神保存“隱藏的種子”，將來冬盡春來，還會發芽。

這一小群宗教難民，在波蘭的來茲諾(Lesznno)定居。

他相信：改革運動終有光復的一天；只是他不知道，那有多麼遙遠。他擬訂計畫，預備全民普遍的全時間少年教育，教導他們本國和歐洲的文化。

他以為教育是要及時，愉快，徹底。他的眼界不僅限於宗教知識，而是全面的教育。他的教育大計(*The Great Didactic*)一書，以為科學知識和宗教知識，都是出於神的啟示。他寫了幼嬰教育(*The School of Infancy*)，要母親們及早教育孩子。

回想自己在校的痛苦經驗，科門尼以為教育方法該是“效法自然”，學習事物，不是死記文法。他寫了世界第一本文字並圖畫的雙語教科書 *Janua Linguarum Reserata*，以捷克文與拉丁文並列，兩種語文的關係，學生可以看圖而知。出版以後，被譯成德文，英文，及其他歐洲文字，全歐風行。

科門尼一向著重整全的教育。1641年，在倫敦有一德國商人哈立布(Samuel Hartlib)，邀請他去英國設立一所社會改革的學院，推廣他全面知識(pansophy)的理想，預備招收各國學生，以教育改進人類社會，促進道德和平。在那期間，他出版了光明之路(*Way of Light*)，哈立布為他製作新衣，如同英國的聖職人員；接待他，同他出入，介紹他認識了不少名人權要，包括彌爾敦(John Milton)。

適英國內戰爆發，1642年，科門尼返回來茲諾。法國的樞機主教，首相利其流(Armand-Jean du Plessis Richelieu)，權傾一時，邀請科門尼到法國。美洲殖民地新英格蘭的總督文慈洛(John Winthrop)正在歐洲尋找哈佛大學(Harvard College)的校長；但科尼流接受瑞典王的邀約，幫助教育改革，為他們撰寫一系列的雙語教科書。

1648年，科門尼被推為聯合弟兄會總監督。

科門尼心繫念波希米亞的光復。有一神秘主義者名叫得來必(Nichoas Drabik)，常作預言；曾被弟兄會停止服事。他預言天主教勢力將被逐出波希米亞，改革者將光復故土。這正迎合流亡國外的難民想望，使他們很得鼓勵。科門尼願意相信，收集了此類預言，成為 *Lux in Tenebris*，在會眾中間傳閱，但並未出版。可惜，那些吉言並未實現。後來，科門尼逝世後，得來必立即否認那些“預言”，並歸順羅馬天主教。不過，雖然見風轉舵夠快，皇帝利溥(Leopold I)仍然把得來必割掉舌頭，然後處死。

在科門尼有生之年，只看見一所綜合知識學校的成立。那是在匈牙利。青年的王萊可滋(Zsigmond Rakoczi)，有意建立一所那樣的學校，邀科門

尼前往主持。1650年，到達那裏，受到熱烈歡迎。模範學校設在撒路八達(Sarospatak)，開學的時候，有一百名學生，歡喜看到理想的實現。不過，學生沒有準備，僅有讀寫的程度；教師不能了解教育的計畫，也失去興趣。1652年，萊可滋王逝世，學校中道崩殂。約在同時，波蘭的戰爭爆發。

科門尼回到來茲諾，攜帶著大批教科書手稿，但缺乏圖畫的雕刻製版；他送去德國紐倫堡(Nurnberg)印刷完成。那書是看圖識字(*Orbis Sensualium Pictus*)，以拉丁文和方言文字並列，在歐洲流行了約兩百年。

1656年，來茲諾被佔領，許多手稿化為灰燼；科門尼再次逃亡，到荷蘭的阿姆斯特丹，那裏以容忍和善待難民知名。有一個富有的工業家德及爾(Ludovicus de Geer)，慷慨以財物支持科門尼，並且介紹他給荷蘭和歐洲的著名人物。

1657年，科門尼的教育著作全集(*Didatica Opera Omnia*)出版，收集他大部分有關教育的作品。

1660年，科門尼寫了信仰手冊(*Ratio Disciplinae*)，是拉丁文，敘述弟兄會的歷史和信仰基要，是基督徒生活信約。

他最後的作品教學參考，只見到部分出版；臨終前，他請求親近同工把其餘部分出版，但他們未能作到，而原稿失落，遲至1935年，才在德國浩邑(Halle)一所孤兒院發現。

1670年，聯合弟兄會最後一位總監督，教育家科門尼，在阿姆斯特丹逝世，遺體葬於西邊的內頓(Naarden)，至今仍有人前往紀念館參觀懷念。

波希米亞弟兄會，後來成為莫拉維亞弟兄會，仍然持守以主為中心的一貫原則：“事奉救主拯救世界”。

這小群的基督徒社團，在1722年到了德國，辛森道夫伯爵(Graf Nikolaus Ludwig von Zinzendorf, 1700-1760)收容他們在他的領地上，名和倫戶特(Herrnhut)，他們仍然照科門尼的原則集體生活，持守在基督裏的愛與合一。並且說：“神帶領我們來到這裏，祂可能要恢復我們的教會。”

果然如此。

1727年八月十三日，和倫戶特的莫拉維亞弟兄會，有了靈性的大復興，差遣宣教士到各島各地，也到了美國。

隱藏的種子，終於發芽了。

模範教牧貝克斯特

在十七世紀，英國有一位傑出的教牧，把一個品德敗壞，人以為最沒有希望的地區，變成了模範教區，成為“城造在山上”，為主發出光輝。

這人是貝克斯特(Richard Baxter, 1615-1691)。

這人有一個特點，就是一生不受人歡迎，可說是左右不逢源。他唯一的錯誤，是要討主喜悅，所以常不討人喜悅。在早年的時候，英國國教聖公會當權；他屬於官方教會，卻同情獨立教會；以後，英王查理一世(Charles I, 1600-1649)被清教徒推翻了，他曾任清教徒軍牧，卻為了聖公會的教牧說話，後來並幫助促成英王的復辟。復辟後，他不接受封立為主教，卻被關進監獄。這個性向中和的和平之子，為了他的意見，給他帶來不少麻煩，受反對，遭迫害。

貝克斯特從早年就體弱多病。在神學畢業後，於1638年受立為聖公會牧師。在那時候，英國的宗教和道德，都極為低落，無論是國家，是社會，是學校，情形都是一樣。但貝克斯特潔身自好，追求敬虔，並且極力與人和睦。

他事奉的地區是期德寺(Kinderminster, Woocerstershire)那地區，約有二十哩方圓，在當時的人口約有三四千，或八百左右家庭。當地的居民，大部分業紡織，酗酒而品德敗壞，惡名昭著。雖然如此，貝克斯特愛那些人的靈魂，以為他們像別的人一樣誠實，而且立心要幫助他們。

他愛他們的靈魂。不管自己體弱，病痛在身，他殷勤的工作，真是拼命工作。他有一首詩說：

主呼召我出去工作趁著白天；
警告可憐的靈魂轉回切莫遲延：
決心儘快去傳播主的道，
隨學隨教導同安波羅修一般。
時時想到我不能活得長久，
心中火熱為得人靈魂爭戰。
我講道，不確知是否能再講，
像將亡的人傳給將亡的人！
啊，傳道者該如何切望得人悔改，
誰知道教堂與墓園原是比较鄰？
看到人在傳講，在聽，在死亡，
轉眼從時間進入無盡的永恒！

因為英國的墓園常就在教堂後面，所以這樣說。他不但勤勞工作，而且誠心竭力。他拒絕盡力求速效和數字的試探，而打下堅實的屬靈根基，要求會眾把教導化為實踐。在品質上，他絕不妥協，在教區一千八百名達到領受聖餐年齡的人中，只接受六百人受聖餐。

許多年之後，追述在那裏所作的工作，貝克斯特歸榮耀給主，感謝主的恩典，同時也檢討在人一方面所作的。這值得關心教會增長的人注意。他的著作，至今為事奉主的教牧重視。

他認為地區教牧的同心合意，有很大的效果。因為他倡導教牧協會，包括區內所有教牧，不管是國教，或任何獨立教派全予容忍，全予接納。教牧的合一相愛，建立見證，可以率導信徒奉行，建立良好見證，保持和睦精神，而且能防止異端侵入，因為建成了沒有缺口的屬靈堡壘。

另一項原因，他歸功於當地信徒都不富裕。他認為對多數人來說，地上物質的豐裕，會阻止他心向天上；他們悔改歸信之後，往往再被貪財私慾迷惑。但期德寺教區的信徒們，多能繼續堅守忠心，注重屬靈的事，因為地上的財富不多。

他在同一地區繼續牧養工作，也有相當關係。在那裏工作了二年之後，英國內戰就起了。戰後，又繼續工作了約十四年多。附近的地區，幾乎每個人都認得他，他也認得所照顧牧養的羊群。

貝克斯特相信保羅的話，以為多年獨身，使他可以專心事奉，對工作大有好處。他自己沒有子弟，能愛所有的教區信徒，都像自己的子弟。一直到1662年，離開了期德寺教區之後，才同敬虔愛主比他年輕二十歲的查勒屯小姐(Margaret Charlton)結婚；那時，他年已四十七歲了。

貝克斯特擅於文學，對於講章總是盡力準備。他忠心有系統的傳講神的話，並且注意適應信徒的需要，針對他們有的毛病。同時，他每次都有

新的供應，增加一部分信徒不知道的新東西，以引起他們學習的興趣，並且使他們保持謙卑，渴慕。這在教學上是很重要的。

他的道德生活，是聖潔公義，無可指摘的。貝克斯特注意自己和自己的教訓，絕非言不顧行，行不顧言；更不是假冒為善的偽君子；連誣捏惡言毀謗他的人，也承認他是聖徒模範。

他堅持自己的信念。當貝克斯特確信所作的是神的旨意，合於真理，他就全力以赴，堅持到底，不問自己要付何等的代價。他本來是聖公會的牧師，但同情非國教的清教徒，不問是長老會，浸禮會，和別的獨立教會；一旦清教徒勝利了，他卻又為聖公會說話。他認為大家都該有信仰自由，主張基督徒無間的愛，而不要求別人都跟自己清一色同路。

貝克斯特的教牧神學，最為卓越。他很關心主所交託的羊群，不把人作為填滿座椅的數字，或繳交奉獻的人民。除了忠心於講壇事奉之外，更注意探訪，像使徒保羅一樣，“在眾人面前，或在各人家裏”，都盡心盡意的教導，凡與人靈魂有益的，沒有一樣避諱不說的(參徒二〇：20)。他把教區所有的家庭，編列一張名單，每周平均探訪十四五家；這樣，至少每家每年探訪一次；這與那些只揀富貴人家跑的，有多麼不同！他看自己是一個盡責任的牧羊人：“我必須知道每一隻羊，他們的需要或疾病，注意他們的迷失，幫助他們，治好他們，帶他們回家。”在實施這方式之後，得到良好的反應，有人向他述說他們的經驗，得到很大的益處；貝克斯特甚至說，有時候半小時的輔談，勝於十年講台教導。這真可說：“與君一席話，勝聽十年道”了。

那麼，他在探訪時作些甚麼？他的逐家探訪，不僅是推心置腹的談話，而是綜合性的，包括家庭敬拜，查考聖經，和輔導。他探訪時，也親自送書上門；所送的書是教義問答，和別的屬靈書籍；不問貧富，家家有分。在那個時代，書籍的價格比現在高得多。哪裏來的錢去買呢？他建議：“如果來得及，由教牧負擔費用；比較富裕的人家，也可以出錢幫助貧窮人；另外一合可行的辦法，是為了購買書籍特別奉獻。”當然，這是喚醒人注意文字事工的方法。他認為，如果任由信徒買書，他們會借口許多理由而不去買，也就不讀書了。但把書送在他們手中，他們就不會推諉了。在此以後的跟進工作，就像是負責的教師一樣，他考問教義，個別查詢會眾對所閱讀的書如何領會，進行討論，加以指導。他相信，這是教導的雙翼：口傳和文字並重(參帖後二：15)。他說，如果誰不肯受教，就不是門徒，也不算基督徒。會眾可以體會，他是誠懇的關懷人的靈魂，所以他的工作，有真實的效果。

貝克斯特深信，聖潔蒙愛的會眾，有聖靈住在裏面，行事為人要與蒙召的恩相稱；所以他注重品德的教導，以在主的道上成長。結果，整個社區都更新而變化，成為全英國的模範教區。這蒙福的效果，延續了一百多年之久。

他不以數字為滿足。因為教會是有靈魂的活人，不止是統計分析的對象，不是沒有生命的百分比。因此，他留意觀察信徒救恩的果子，生命的改變。他說：

無神思想是一切邪惡的總合；所有真虔誠與敬虔，是奉獻為主，與祂有心靈與生命的關連，為祂而活。實際的無神論，是表現在生活上，像世界上沒有神一樣。真敬

虔剛好與實際的無神者相反，相信神的存在，因此，無論處世為人，或在教會裏，都是一樣的，這就是與神同行。... 敬虔是一切宗教和道德的總和。

貝克斯特堅信，信徒應該順從主的絕對主權，以主為最高的利益，為生活的中心。如果不是這樣，那就是實際的無神論者。基督徒應該有效法基督的生活。這是從清潔的心生發出來的。他說：“人不是舌頭；心才是那個人。”

他一再強調，基督徒品德的重要。基督徒有良好的道德生活，才是正常的基督徒。如果只為了自己而活，是病態的，要從主得到醫治，過聖潔的生活，遵行神的旨意。這是健全的，是理所當然的；這要靠神的恩典，順從聖靈，絕不是“心為形役”，為了肉體活著。

在今天，有一行人，把教會當作宗教生意，玩噱頭，搞廣告，弄數字把戲，以為這就是教會事奉。有時候，甚至黨附政治，歌功頌德，點綴昇平，把主的身體，貶為政權的尾巴。更有的人則把現今的世代看成無望，以為新黑暗時代即將來臨，教會腐敗至不堪救藥。如果只看人的情形，他們都有理由；但忘了一件事，就是聖靈的工作。

貝克斯特當時的情形，跟我們現在大致沒有兩樣。他出身英國國教，卻沒有視為職業，當作名利的階梯，進而被封立為主教。他也沒有咒詛黑暗，更不曾加強管轄，排除異己。他靠主默默的耕耘，培養建立聖徒，擴展主的國度。

這是世界的希望。這是主的託付。願先賢的典範啟示教導我們，激勵我們，存盼望，憑信心，殷勤工作，直到主再臨。

附錄：

教牧與合一

貝克斯特

作為一個教牧，我們需要視教會受傷損為自己的傷痛。不要領袖分爭；倒要防止分裂，尋求醫治。不分晝夜，我們要設法彌補破口，使它不再擴張。我們不僅要談說教會合一，而且要尋求合一，為此目標盡力。我們不但要尋求和睦，就是當它跑掉的時候，我們也要一心追趕和睦。

我們要謹守固有的原始基督教信仰，建立我們的根基，在原始的合一上面。要遠避某些自高的人，擾亂分裂神的教會，還假作是改正錯誤，固守“真道”。當然，固守真道是很要緊的；但不要讓人加上甚麼別的東西。

我們必須學習清楚分辨確定的和不確定的，基要的信仰和猜測的理論與解釋。然後，我們可以清楚分辨信仰的要件，或僅是個人意見。教會的和平，在於共守的信仰，不在於個人的見解。

因此，我們必須以歷史性的神學為確據，看教會曾如何奮鬥以保持信仰。我們也必須熟悉早期教父的著作，從他們更清楚的教導和解釋得到益處。但這些的本身，都不是我們對神的愛和信仰的基本要件。

有的人根本是異端，有的不過是溜嘴說錯話，不應該混為一談。某些人不自己去尋求了解事實，就把弟兄離棄了，是何等可悲！

我們要學習瞭解分爭的基本理由，分析其究竟是出之於偏見，或是真正的差異。切不可把差異弄成更糟。不要跟弟兄爭吵；寧可彼此同心，共同對真正的仇敵爭戰。

因此，教牧們彼此聯合，友好團契，互通音問，是很重要的。要時常共同聚集，以促進合一。我們會發現，意見上容或有小異，但不會妨害團契的大同。

我們要儘量尋求和睦合一 [正如清教徒長老大會實行的]。不是要立法訂規，轄制別人；卻是要免除誤會，互相協商，彼此建立。神的話命令我們相愛和團契。

如果所有教牧人員，都喜愛和睦，完全合一，而沒有分門別類的心意，基督的教會，就不至於到今天的地步。如此，海外的加爾文主義和弟兄會派的人，國內不同的宗派，就不會各懷異心，彼此傾軋。他們持續的互存怨毒，只能幫助共同的仇敵；但那會阻礙教會的建立和健全。這是不該有的現象。

有人說他愛虛榮，有人以為關心社會，就是忽略福音，或說關心平民教育是破壞主日的不敬虔行為。但主日學運動，到底傳開了。到今天，雖然再沒有誰來反對了；不過，仍然需要再加強推行。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教會遭受自由派的侵擾。正統的基要主義者，採取“敬虔的逃避”政策，倉皇尋求自保，以至避社會福音，也避免關懷社會：只傳個人得救的福音，不涉及社會疾苦。也就是說，只求人將來進入天堂，不管他現在陷於地獄。幸而教會保留了主日學，就是宗教教育，使後來的一代，得有復興的機會。

主日學的創始人睿可司 (Robert Raikes, Sep. 4, 1736-Apr. 5, 1811)，生於英國哥勞斯特 (Gloucester)，父親在當地擁有一間哥勞斯特日報 (*The Gloucester Journal*)。1757年，父親去世後，他以二十一歲的少年作了發行人，接手經營。

哥勞斯特是一個古老的工商業城市。因為受到工業革命的影響，造成嚴重的貧富不均現象，犯罪率很高。睿可司有興趣於監獄改良工作。他隨即發現，監獄並不生產罪犯，是社會生產罪犯。他看到許多幼年童工，每天勞苦在工廠工作，星期天休息，則游蕩無所事事。他們既沒受過教育，品行一般都很惡劣，容易感染壞習慣，正是培養罪犯的溫床。因此，睿可司商請鄰近教區牧師司陶克 (The Reverend Thomas Stock, 1749-1803) 的同意，發動了幾名婦女，自己出薪資延請他們，在各人家中召聚兒童，給他們基本的讀書課程，和聖經，並教義問答等宗教教育。

1780年，在當地的聖公會教牧支持之下，開始了這種稱為“主日學”的事工。睿可司在他的報紙上撰文倡導，漸漸引起了普遍的興趣；在全英國各地，都有人效法。於是，主日學漸成為教會的事工。後來，教員也從受薪而改為義務事奉。這項運動極為成功。在1783年十一月三日，*Gloucester Journal* 撰文宣稱過地獄般生活的兒童們，享受到“主日的天堂”。

像任何新興的事工一樣，主日學也受到人的反對。教會中有人反對，以為那會破壞虔誠的敬守主日；更有人反對普及平民教育，認為那會引起人民造反，發動革命！

在那時，英國的坎特伯里大主教，叫各地的主教們共同設法防阻，並引用出埃及記第二十章8節，指那是違反“安息日”。他們正好跟耶穌在世時的文士和法利賽人，先後如出一轍。

大西洋另一邊的美國，當然也不乏自命“信仰純正”的衛道之士；康涅提克州的一位牧師，也同聲唱和，以為在“安息日”設堂講課，那還了得！他激烈聲討，不准在教堂開課：“你們撒但的差役，作魔鬼的工作，我要把你們踢到街上去！”

不過，主的教會中，到底不乏開明智慧的人。主日學運動，得到約翰衛斯理的贊成，並協助推廣；連王后也予以支持。在當時，以敢言知名的政治家福克斯 (Charles James Fox, 1749-1806) 也曾贊成。1785年，在倫敦設立了主日學協會。主日學運動也超越了大西洋；1791年，美國聯邦憲法通過後僅二年，在非拉鐵非成立了超宗派的主日學協會。到1811年，睿可司去世的時候，建立了三十一年的主日學，單在英國已有約五十萬學生。現在，更不分宗派，主日學已成為教會普遍接受的節目，是宗教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環。主日學的教室，保守許多孩子免於走進監獄，卻走出去不少的領袖。

美國的主日學，本來發展最快；以後，到了提倡公立學校的曼恩 (Horace Mann, 1796-1859) 起來，主日學就不再是貧民子弟獲得教育的唯一地方，影響力也低減了。

後來東正教也有主日學，其他宗教也有仿效的宗教教育。天主教則大致無主日學，而有其自己的宗教教導。

我們都應當記得：宗教教育是教會的骨幹。不止幼童應該參加主日學，成年人也應該參與；不是主日學的教員，就該是主日學的學生。注重宗教教育的教會，信仰都有良好的根基，也能迅速的增長。

司布真

十九歲的司布真 (Charles Haddon Spurgeon, 1834-1892) 到了倫敦新公園街浸禮會，坐在基勒博士 (Dr. John Gill) 的椅子上。那鄉下的少年，以為連給偉大的基勒博士擦鞋都是光榮，現在竟然穿基勒的鞋！

當然，那時的查理司布真還不知道，他將來的成就要遠超越基勒，全英國以至全世界都要感覺得到。

查理. 司布真，英國十九世紀真理的聲音，於 1834 年六月十九日，生在開福頓 (Kelvedon)。他的父親約翰. 司布真 (John Spurgeon)，是公理會的牧師，有十七個孩子，查理是長子。在他幼年的時候，父親移家到考徹斯特 (Colchester)，並照顧附近市鎮的一個教會。查理大部分時間跟著祖父，同住在古老的司坦本鎮 (Stambourne, Essex)。他祖父雅各 (James)，

是獨立教會的牧師。從小受福音派信仰的熏陶，小查理內心深深感覺自己有罪，不能榮耀主的名。他從祖父學習講道。

約翰司布真忙碌於教會事工，時常在外，少有時間照顧孩子們。但母親非常敬虔，經常教導孩子們聖經，逐一為他們提名禱告。

查理所受正式教育不多。因為他是長子，父親收入有限，他覺得有責任幫助家庭，至少不該增加父親的負擔；因為那時進牛津和劍橋大學，費用非常昂貴，而且必須是國立教會的信徒，他父親屬於非國教的獨立教會，子弟根本就沒有讀大學的希望。所以他在一所小的學校，作個助理教員。不過，他自己勤於讀書，自修法文，拉丁文，後來也讀希臘文和希伯來文，並精於數學。後來，接受朋友的建議，他自己設私立學校，招收學生。

有個冬天，他在考徹斯特家中。照他的習慣，每主日都要去教會聚會。但那天風雪實在太大，中途不能繼續前行，就改去附近的原始循道派教會。本來就小的教會，那天人數更少，大約只寥寥十幾個人。牧師也可能因為天氣惡劣沒有來，由一個瘦瘦的人代替講道。那人似乎只是一名普通信徒，他的經文：“地極的人都當仰望我，就必得救。”（賽四五：22）

那講道者的語音拙劣。他說：“我的朋友們，這實在是一段簡單的經文。你只要仰望，用不著費多少力量，不需要動手勞腳，只要仰望。用不著大學教育，誰都能夠仰望。你可能是個大笨蛋，你也能仰望。一個孩子也能仰望。...耶穌基督說：‘仰望我。’”

講道者似乎再無話可講。出人意外，忽然轉向司布真，指著他說：“年輕人，我看出你非常痛苦；你如果不順從我的經文，你將一直痛苦，活著痛苦，死也痛苦。如果你現在順從，就必得救。年輕人，仰望耶穌基督。你不需要作甚麼，只要仰望而得生。”

那講道實在粗淺，但帶著神救恩的大能。司布真後來寫著說：“我仰望，陰雲立時消散，看見了陽光。我能夠站起來，同最熱誠的會眾歌唱基督的寶血，只用單純的信心仰望祂。”

當天晚上，司布真興奮的告訴他父親，那天的經歷，如何得到救恩。父子談到夜深。

查理為要明白真理，時常讀聖經。他日漸清楚堅信，人類的希望，在於聖經所啟示的神。人類憑自己的努力不能自救，只在於神在基督裏為世人成就的救恩。因此，他知道清潔的行為，是發自重生的新心。

他立即向人見證悔改重生的好消息，說明在基督裏的滿足和喜樂。他也接受神的呼召，傳揚十字架的福音。

查理司布真的事奉，由教導主日學開始。不久，一位年長的信徒，臨時安排那年輕人，在劍橋附近的一個鄉村小教會，作第一次講道。那實在是個考驗。查理選定的講題經文：“在你們信的人就為寶貴。”（彼前二：7）他那時還不滿十六歲。

參加聚會的人數不多，不過，進行很順利，司布真並沒有緊張，也未中途詞窮。有個婦女顯然很希奇，在將要結束的時候，突然問道：“你多大年紀？”小佈道家嚴肅的回答：“你必須等聚會過後才發這樣的問題。現在，我們唱詩。”

在劍橋一帶，查理成為頗受歡迎的講員。他願意不倦的工作，不倦的學習，不倦的從工作中學習。他走遍鄰近的鄉村，進到村舍裏，問是否可以借用他們的客廳，作聚會之用。多數是得到許可。於是司布真就在那裏

講道教導。如果遭受拒絕，他也不在乎在樹蔭下聚講。許多人聽到他的信息：不止是出於好奇而聽孩童佈道家，是生命得到真實的改變，重生得救了。

1852年，未滿十八歲的少年查理，正式受任為劍橋附近華特灘（Waterbeach）教會的牧師。聽到他的人見證說：“他的講道非常出色，像是有一百歲經歷的成熟基督徒。”他的會眾有時達到過四百五十人。他們熱愛那位年輕牧師。

他的名聲傳揚開來。這對初出茅廬的人，確是一個試探。就在那時候，他聽到了有個聲音警告說：“你為自己圖謀大事嗎？不要圖謀！”

1853年十一月，他照常領華特灘的聚會。在打開詩歌本的時候，發現有一封從倫敦給他的來信。打開來看，是倫敦新公園街浸禮會的正式公函：邀請查理司布真，這鄉下孩子，到那著名的大教會去講道。司布真回信自我介紹說：他雖然已經有兩年牧會經驗，不過，他只有十九歲多；如果他們認為沒有不合，等十二月十一日，他才可以去，現在無法分身。回信來了，接受他於那天去。

司布真於前一天到達倫敦。那是個陰寒的日子。教會的執事為他安排住在青年宿舍。他一夜不能好睡。

1853年十二月十一日的主日，司布真向人問路，孤單，穿巷過路，徒步走向那歷史性的教堂。

倫敦新公園街浸禮會，是非國教教會中有數的幾個大教堂之一。外觀巍峨宏大，進到裏面，才更覺得宏大；偌大的建築物，只有幾十個人。新公園街的盛況和光榮，已經過去了。

司布真那天的經文是：“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裏降下來的；在祂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來一：17）

年輕的講員說：“沒有祂，大地是一個黯淡的穹窿；有了祂，就是亮光和喜樂；在這走廊的盡頭，要進入更光明無比的蒙福境界。”

聚會結束的時候，會眾感到驚奇：這少年與所有外來的講員不同；他的聲音有吸引力，清越而帶著超凡的能力；他遠比實際年齡更成熟，難說他的智慧或外觀哪個是實際年齡；而他對聖經是那樣精熟。

晚間的聚會，每個參加早聚會的人都回來了，並且帶別人來。那次的經文是：“他們是沒有瑕疵的，在神寶座前。”

講員不管下次會不會再受邀，儘量的傳揚基督和祂被釘十字架，指責罪惡，警戒人，勉勵人。

教會的會眾，在散會後立即開會，決定請他明年一月來兩個主日。然後，要他答應半年的試約。但司布真只應允去三個月，雙方可以不受約束，隨主引導，自由決定是否續約。

新公園街的環境改變了。在主日，街道上非常擁擠，車水馬龍。教會的會眾繼續增加，座為之滿。禱告聚會恢復了。許多人來自各階層，申請加入會籍。艦隊街的報社，派記者來，報導聚會的情形。

教會決定立即永久聘請他。但司布真要等到滿二十歲，才正式就任。教會可以等。好在那日子就將到了。

從威特腓(George Whitefield)和衛斯理(John Wesley)以後，倫敦和英國的教會，就沒見到這樣充滿活力。

新公園街的教堂實在太小了。教會的執事們，考慮加以擴建。為了應付需要，租愛克塞特大廳(Exeter Hall)，作為臨時主日聚會的場所。那也不能容納各地湧來的會眾。唯一可用的場所是皇家音樂廳(The Music Hall in Royal Surrey Gardens)，位於倫敦蘇瑞園，能夠坐萬人以上。

新聞報導，查理司布真將於十月十七日在音樂廳講道。在前幾天，教會的俄尼(William Olney)執事，陪同司布真去察看那場地，他們都擔心實在過大。但到了那天，有一萬二千人坐滿會場，外面還有成千人不不得其門而入，講員要從側門進入。

聚會開始，讀經，唱詩後接著禱告。就在那時，忽然有人大喊：“失火！”另一邊有人喊著：“樓廊塌了！”一時秩序大亂，人潮爭相湧向門外，以至互相踐踏，結果七人喪生，二十八人受傷入醫院。司布真盡力維持秩序，但聲音被混亂所淹沒。聚會不得不結束，有的人安靜離去。

教會儘量籌款幫助受傷的人，安慰死亡家屬。司布真受這事件刺激，神經瀕於崩潰，在一個朋友的家中，有好幾天是臥伏，瀕臨死亡，然後慢慢恢復。他決心回到蘇瑞園音樂廳。這對於講道者是嚴峻的考驗：一切都恢復如常，每個主日滿座，場地還嫌太小。

沒有人表示幸災樂禍；不幸，對這樣的效果，基督教中有些人士加以批評，把司布真講得一無足取。司布真的講章集出版後，印銷比其他所有的教職人員合起來還多，這就更火上加油。有人說他的神學立場錯誤；有的說他欠缺教育；有的挑剔他在非“聖堂”聚會，雖然他們不肯供應他所需要的場地。一般普通報刊反倒好得多，他們態度公正，說他真誠而有恩賜。一年後，浸禮會協會的機關報，仿佛忽然醒來，稱司布真見解獨到，並有神聖的能力，對教會前途有益。

司布真到了成人的年齡，但他還沒有按教會的規矩，正式按立。當然，司布真自己不會去尋求名銜；是教會向他提出這意見。他回答說：如果教會堅持，他可以接受按立，也不反對別人受按立；但那不是他個人的意願，也不認為有必要。他講了一篇道：“人子啊，我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他以為有神的按立和聖靈印證，是最重要的，也是充分的。這樣，按立問題就止息了。但其他的教牧同工，和他的學生中，有“按立”的牧師。

1856年一月，查理·司布真與蘇散娜(Susannah Thompson)結婚。婚後夫婦同心，生活簡樸，他們每為自己用一鎊，最少有五鎊用在別人和聖工上面。司布真夫人一生健康欠佳；但她克服軟弱，節省的錢，購買成千冊的書籍，送給經濟條件不好的傳道人。她自己養牛，所產的牛奶，家人用不完，賣出的錢，用來在冬天施粥和麵包，給貧窮需要的人。

有個喜勒雅夫人(Mrs. Hillyard)，自己並不是鉅富，但關心無依的孤兒，捐助錢財，供應他們的需要，成為司陶邑孤兒院(Stockwell Orphanage)，收容成千的可憐的孩子們。後來司布真的雙生兒子多馬和查理(Thomas & Charles)先後任過院長。

司布真有時也在倫敦以外講道。1857年夏，回到劍橋。那裏附近的人，在一個村中為他搭建綵門，有三千多人在戶外聚集，是那僻靜的地方從未有的盛事。

同年十月七日，各界在水晶宮(Crystal Palace)舉行大會，為了印度的暴動謙卑禱告。那聚會人數有二萬五千人。司布真在會前一天，同一個朋友去試那建築的音響。他喊：“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有個工人聽到了，以後向人見證說，因那經文而得救了。在那會中，司布真為殉難者遺下的孤兒寡婦募集義款。

在1856年六月，新公園街浸禮會有教會最歡迎的問題：聚會場地太小，愛斯客特廳也擁擠不堪，每天有許多人向隅，事工明顯受限制。司布真告訴教會，如果他們不設法解決，他就被迫另換事奉的地方。這是教會所不敢想像的事。教會決定必須另覓適合的地址，建立新堂。地點要安靜，而交通方便。結果，找到了近郊的紐文屯(Newington)，靠近馬車站。要建立可容五千人以上的教堂，當時的造價，估計要三萬一千英鎊。這在當時是個極鉅大的數目。有人說：在那麼偏遠的地方，造這樣大的教堂，如何能夠坐得滿人？而且還要每主日坐得滿？又有人說：那教會永遠不能籌得足夠的款項，簡直是自掘墳墓！

那個鄉下孩子，來到倫敦，還只兩年。他記得那聲音：你為自己圖謀大事嗎？不要圖謀！

他是為了主的事工和榮耀。

開工後，司布真宣布，要付清每一分錢，才啟用新堂。有朋友來看他，約他出去坐車兜一會兒。那人問司布真，建造的費用還缺多少。回答：還差兩萬英鎊。那朋友說：“我要免你焦急，這裏有兩萬鎊的支票，可以拿去存在銀行裏，有需要隨時隨意多少都可以用。”

到建造完成的時候，司布真只接受了他五十英鎊的奉獻。

大都會會幕(The Metropolitan Tabernacle)，於1861年三月竣工。可以坐五千五百人，加座位容納六千人也不擁擠。在奉獻啟用前一個禮拜，三月二十五日，舉行二千人的禱告會。

新堂啟用的那天，會眾聚集到滿溢，超過最大容量一千人以上。會眾從倫敦，從各地方湧來，要領受神藉祂僕人傳出的話，如同渴慕甘霖。從開始，一直到司布真離世的日子。

1860年，教會勸請司布真作短暫的休假。他去到瑞士。

不論到哪裏，都有人請司布真講道。司布真不能不講道。他最歡喜的，是到日內瓦。他受邀在加爾文(John Calvin)的講壇講道；他本來不喜穿宗教外衣，也破例歡然穿上加爾文的禮服。宗教改革史學家奧賓(Derle d'Aubigne)，請他住在家裏：是加爾文曾住過的屋子。這位年輕的加爾文主義者，正在加爾文寫基督教要義(*Christiane Religionis Institutio*)的年齡，雖然不是迷信，卻感覺甚為榮幸。

司布真充分接受加爾文的信仰，包括相信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和神在信徒身上和社會每一部分的主權。

當大都會會幕堂還未建成的時候，週間的聚會仍然在新公園街。有從南卡洛來納州逃出的黑奴John Andrew Jackson，在聚會中述說如何受虐待和脫逃的經過。司布真說：

奴役制度是國家最醜惡的玷污，必須用血來洗除。... 他們說，那是特殊的制度，正像魔鬼是特殊的天使，地獄是特殊火熱的地

方。就我來說，我認為那是悲慘的可厭的罪惡，絕不跟任何涉及這罪的人相交。

那時，美國的南北內戰還未開始，司布真就預言美國奴役制度的罪惡，“必須用血來洗除”，仿佛反奴役的先知殉道者布朗(John Brown, 1800-1859)的聲音。也許，那是美國反奴役者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的迴響。林肯總統也說過類似的話，是在幾年以後。司布真又說：我從心靈的最深處恨惡奴役，不論在任何地方。“我可以容納任何宗派的人，在主的桌子同領聖餐，但絕不與蓄奴的人有任何團契或交往。”

不過，堅守立場總是要付代價的。美國南方的教會，激烈反對司布真，不再銷售他的書，甚至有人焚燒他的著作。

同加爾文一樣，他注重教育。司布真所帶領悔改信主的人中，有些人熱心傳道，只是缺乏知識；其中有從事一般行業的人，明顯有恩賜，也蒙呼召，來向他個別學習，經過短時期，居然頗有進步，引成千的人受浸皈主。不過，如果要這些人去進大學，就難以通過入學資格考試。經過同兩位牧師商議禱告，1865年，“牧職學院”產生了。

學院建造在都會會幕堂後面的地上。起初，學生不多，經費的主要支持者只有兩人，加上司布真夫婦。不久以後，全英國浸禮會九所學院總共264名學生，牧職學院約佔三分之一。學院校友的事奉，大有效果。在十年後，他們共給20,677人施浸；他們的教會增加了30,677人。學院畢業的學生，成為許多個司布真，對以後的世代影響深遠。

司布真自己同學生們保持密切聯系，同他們個別談話，一同禱告，有時約在家中用餐。

司布真也是著述豐富的作家。從早年開始，他每週講道，整理出版，成為講道集，前後達六十二年之久；最後的講章是於1917年五月十日出版(第3563號)，在司布真離世二十五年之後，真是“雖然死了，因信仍然說話”。

他還有許多別的著作，流行在英語世界，並經譯成多種外國文字。

文字聖工的目的，不是自我欣賞，而在於傳播；傳播的功能，是福音影響人的思想，改變人的生命。信息是聖靈工作，可以不脛而傳；但種子需要藉脛而播。所以單出版不能達到目的，必須有人推廣。

司布真注重鼓勵信徒讀書。1866年，他召集了幾個青年人，開始組成售書會(The Colportage Society)，並且建立文字基金，兜售良好的讀物，特別對疾病軟弱的人有幫助。這是著重根本，很平常，卻是有遠見的工作。

1887年，司布真對英國浸禮會聯會的信仰立場不滿，覺得他們有摸稜退步，要求負責人發表宣言澄清。後來爭執得不到解決，導致他決定宣佈退出浸聯會。最使他痛心的，是自己培育的學生，有的也參加了反對的陣營。

當然，神的僕人不會貪圖誰的財物。司布真半生所負的十字架，一直包括疾病。其中之一是痛風(gout)纏身。在倫敦灰暗的天氣，加上痛風發作，容易覺得環境和人生也灰暗了。在這樣的心理消沉下，住進醫院裏，不是好的經驗。有一次，這信心的偉人住進醫院，為了他將來的經濟問題而心情陰鬱。一位朋友看見牧師如此，心中很難過，回到家裏，搬來他所

有的財產契券，放在司布真面前說：“這是我一切所有的，全是神藉著你給我的，我可以全部給你。”司布真看了，心情忽然晴朗起來：不是為了朋友慷慨和信任，而是想到為神使用工作的果效，知道自己的愚昧，病就好了。

五十五歲以後的司布真，健康就有退步的跡象。他到法國地中海邊的萌屯(Menton)休養，藉以恢復，就重新得力。

1891年，倫敦有流行感冒。司布真雖然衰弱，仍然勉力工作，繼續講道。不過，他似乎預感自己在世的路程將盡，要求教會增聘講台的同工，結果邀聘司陶特(William Stott)牧師就任。

五月十七日，司布真在聚會的時候，讀經未完，即感覺不支，退下休息。但他漸漸復元。

六月七日，他已能夠講道，經題是：“大衛的典章平分擄物”(撒下三〇：21-25)。他勉勵會眾：“主的愛何等豐盛。事奉主是生命，喜樂，平安。啊，要立即參與！神幫助你，投身在耶穌基督的旗幟下！”這是查理·司布真在世最後的講道。

那個禮拜五，情況轉壞。九月間，移地休養。十月，漸漸有起色。司布真盼望能夠恢復工作。但病情又再惡化。

倫敦冬天的冷霧，不適合於病人。於是，司布真由所愛的妻子和幾個朋友陪同，在十月二十六日啟程再去法國南部的萌屯休養。不過，這次沒有復元的奇蹟出現。

1892年一月三十一日，查理·司布真在地上的日子完畢，這“講道的王子”，進入了永世，去見他所傳揚所事奉的那位萬王之王耶穌基督。

司布真講道的特點，也就是他的品格：誠實，坦白，正直敢言。他希望在自己離世的時候，也可以像保羅一樣說：“你們中間無論何人死亡，他的血不在我身上，因為神的旨意，我並沒有一樣避諱不傳給你的。”(徒二〇：26,27)

他有次告訴人，他之所以有那樣的成就，是由於“我的母親，和我真理的信息。”

有一位美國的牧師，問他工作成功的秘密。司布真告訴他說，是地下室的“鍋爐”，然後領那人去看，在那裏，有六七百人為他們的牧者禱告，供應教會熱力。那是使徒古老的方法：“以祈禱傳道為事”。

講道王子也是禱告王子。

王明道

大日本皇軍征服了支那大部分的土地，以為不久即可滅亡中國。但竟然征服不了一名小小的中國人！而且這中國人是個沒有宗派背景的孤單教會負責人：他是北京的王明道。

在佔領區，日本的政策，是要中國教會也照日本的形式，組成“教團”，是為了便於聯繫管理。這個指示傳達下來，華人教會自然只有說“是”，只有奉行的份兒。這才是“日支友好”的表現。他們希望是這樣。果然，許多中國基督徒這樣作了。卻想不到在首都就遇到了阻擋：王明道的基督徒會堂，不肯照日本人的意旨行事。

1900年七月二十九日，王明道誕生於北京。他本來的名字叫作“鐵”。他為人也是像鐵一樣剛強不屈，一定持守真理。主使他成為“堅城，銅牆，鐵柱”（耶一：18），蒙主的召命，作當世的亞坦耐修(St. Athanasius)與罪惡和“不信派”反對，絕不肯妥協。

他的堅持真理，從他信主事奉主的路線可以看出來：他本來是受點水洗禮的；但到從聖經明白，全身的浸禮更是耶穌的榜樣，他就堅決要受浸禮，在寒冬裏，打開河面的冰，到水裏受浸。他用許多時間讀聖經，而且照著所讀到的去遵行。他沒有受過神學教育，也沒有進大學；不過，他對聖經的真理，有從神來的領會，也照著所領受的傳講，教導；由家裏開始，到建立了頗有規模的會堂。不用說，所走的，自然是艱苦的信心道路，十字架的道路。

現在，考驗臨到了。他知道，是在日本人的管治之下。但他也知道，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他表明要照聖經的真理，沒有奉迎人的意見，參加教團的意思。

負責宗教管理的，是興亞院華北聯絡部文化局，調查官武田熙。這個聽來像是民間的機構，並沒有憲兵隊那樣的唬人權威，實際並不是那回事。王明道面臨的是很大的危險。

當局當然不滿意他的表現，通知他準備到時去問話。誰都可以知道，一去就不用準備再回來。

那夜，月華如水。他自己一人，在會堂裏徘徊，踱步，思想，禱告：主立他作群羊的監督，他必須為羊群作榜樣，不能夠因為自己的安危而妥協；但那不僅是自己安危的問題，如果違背命令，會堂被關閉了，羊群豈不是要分散了？十多年的辛苦工作，才能有今天的成就，是何等的不容易啊！現在，教會蒙主的恩典，已經度過了起初成長的艱難時期，已經在穩定的增長，每次聚會，都是人滿；怎能夠想像擊打牧人，羊群分散的淒慘情形，幾百的靈魂，又有誰照顧牧養他們？

何況還有自己的家庭：老母需要人奉養，妻子景文，帶著不到十歲的兒子天鐸，如何能夠生活下去？

但在另一方面，信仰必須持守，見證不能失去。...

1521年馬丁路德在沃木斯供證前夕的經歷，四百多年之後，臨到王明道的身上。他在神的面前禱告。禱告使他得著力量。他作了決定：絕不能夠妥協，不論付任何代價；因為有各種不同信仰的人，參加在教團中的，並不都是敬畏神重生得救虔誠的基督徒，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負一轡（林後六：14），為了信仰，他不能參加。如果這樣作，有甚麼不幸的後果，就只有交託給主了。因為如果參加了教團，在教會聚會的時候，就得先面向東方而立，向天皇致敬，為天皇祈禱。當然，那不是基督徒應該作的事。這樣，無論如何，沒有回轉的餘地；作為基督徒，任何代價都得付的。

王明道作了決定。他準備好了。心情平靜下來。回到床上，一直睡到天亮。

主日聚會那天，王明道的講道是但以理書第三章：“火窯獅洞的見證”。講員向會眾指出：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三人，面對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絕對不肯妥協拜偶像。王特別優待寬容，願給他們再一次的機會：“你們不事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嗎？你們再聽見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樣樂器的聲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卻還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時扔在烈火的窯中，有何神能救你們脫離我手呢？”

三個青年人的回答很是決絕：“尼布甲尼撒啊，這事我們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們所事奉的神，能將我們從烈火的窯中救出來。王啊！祂也必救我們，脫離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當知道：我們決不事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他們斷絕了後退的路。他們說：“我們不必回答你，...我們決不！”但行神旨，莫問前程，正是應該有的態度。救不救，是神的事；不拜偶像，是我們的責任。斬釘截鐵，沒有迴轉的餘地。

基督徒應該有這樣對真理忠誠的態度。如果有一天，我王明道失去了對真理這樣的忠誠，你們可以背棄我，叫我是出賣真理，賣主的人。

第二天，王明道抱著羊入虎口的決心，去見日本代表。

那日本人倒並不凶惡。他有禮貌卻堅定的向王明道表示：教會參加教團，是東京的政策，勢在必行，不容甚麼人反抗。然後，問王先生有何意見。

王明道簡單直接的告訴他：自己一向遵行聖經的教導，根據聖經的真理，他不能夠參加。

日本本人冷肅的問：“王先生，你要不要再考慮？”

回答是：“我已經考慮好了。我不能夠參加。如果我對你說‘再考慮’，那是拖延，是說假話。我不能那樣作。”

日本人沒有再威脅他。站起來，同王明道握手，有些熱烈的表示，擺手要他回去。

王明道從那裏出來，看到天色分外明亮，低頭感謝主的保守，使他打了一個勝仗。

他並沒有從此遠避天涯。後來，他們還見過面，武田仍然表示相當禮貌。有人在別處遇見武田，問他：如果每人都像王明道，政策會怎樣推行。武田說，他知道別人不是王明道。

王先生的特點，是從來不說討人喜悅的話。他常說：“王明道‘不說吉語，單說凶言’！”他實踐真理，“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腓二：15,16）他不是憑佞口，存貪心，求得人歡喜，為得利諂媚人；他不計自己的利益，惟求所事奉的主喜悅。在他所撰“基督徒處世格言”裏，開頭是：“以敬畏主為立身之基，以愛鄰舍為處世之法”；結尾說：“事事為別人著想，處處求榮耀主名。”中間全說到從信仰產生的品德，這是真生命的流露，不同於那些口口聲聲講生命，卻沒有生命表現的人物。他不諱言，自己也有錯誤的時候，但他靠主改正。他一生絕不假冒為善，絕不趨炎附勢，更是恨惡謊言。這是內住的道發生的力量。

許多年之後，王明道經過更多的試煉，“鐵”變成了鋼。

我再次見到這雙老夫婦的時候，王師母彈著小風琴，王先生仍然宏亮的聲音，和來客同唱：“主耶穌一路領導我”。當握著他經過風霜的手的時候，感受到那雙手，是主握著引領他們走過一生。

1991年七月二十八日，王明道先生在上海去世了。



倪柝聲

中國的基督徒中間，有流行的話說：“賈玉銘講道理；王明道講道德；倪柝聲講道路。”早期基督徒的名字，是“這道的人”；顯然的，如果那是說神國的道路，則“必須經歷許多的艱難。”（徒一四：22）

1903年十一月四日，一個福州牧師寡婦的兒子倪文秀，在妻子連生了兩個女兒之後，歡喜的看到他第一個男孩子在汕頭誕生，給他取名述祖。後來他們一家回到福州。孩子長大後，進入三一書院讀書，英文名字叫 Henry。

述祖長的高大英俊，特別聰慧，在校成績很好。

1920年，一個女醫生余慈渡，到福州講道。述祖的母親信主悔改了。她來向自己的兒子認罪說：“請饒恕我！我在生氣的時候錯打過你。”

述祖回答：“是的，實在有過。為此我恨你！”然後，轉身就出去了。

不過，那夜他睡不著覺。

第二天，他也去參加聚會，生平第一次，他看見自己是罪人，也看見主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伸開雙臂接受他。被主的愛感動，他痛哭認罪，悔改，第一次禱告，經歷了喜樂和平安。那夜，他知道，不僅是接受基督為救主，也同時接受祂為主；不僅救他脫離罪，也脫離世界。

述祖改名“柝聲”，英文 Watchman Nee。

作為基督徒，柝聲知道必須悔改，認罪，對付罪。他先去向校長承認考試作過弊；但沒有照他所想的被開除，而有了內心的平安。

福州郊外不遠，有個英國聖公會宣道站，那裏的女宣教士和受恩（Margaret Barber），對於這初生的基督徒有極大的幫助，使他終生難忘。她二十幾歲時來中國，在一女子中學教書十多年，被一同事嫉妒誣告，差會停止對她支持。和教士不聲辯，自己憑信心獨立工作。她教導柝聲“十字架的功課”，“破碎自己”，並讓他看許多幫助靈性的書籍，特別要他學習謙卑，保持對神的渴慕，渴慕讀聖經神的話。她的箴言：

全不為己，完全為主。

I WANT NOTHING FOR MYSELF;

I WANT EVERYTHING FOR THE LORD.

柝聲飢渴般的讀經，他立志，每週至少讀新約聖經一遍；又學希伯來文和希臘文，以幫助了解。他勤於禱告，記下校中同學的名字，每天為他們一一代禱。幾個月內，七十名同學之中，除了一名外，其餘全部

得救了。

1921年三月二十八日，復活節，柝聲母子由和受恩教士為他們施浸；在閩江中全身受浸。他們認為這樣才合於聖經的榜樣。

一隊年輕人，由倪柝聲率領，在街頭傳福音。他們採取救世軍的方式，用白布自己縫製背心，上面寫著：“信耶穌得永生”等字樣，以吸引人的注意。當然，這在當時風氣閉塞的中國，是頗不平常的。這樣，工作頗有效果。

柝聲仔細查考聖經的結果，覺得應該遵從聖經的教訓，不計任何代價，必須離開宗派；他們也認為該每主日擘餅記念主。於是，柝聲去王載家，與他們夫婦二人一同開始聚會。王載比倪大五歲，是一名海軍軍官，也是為福音熱心。不久，另一個少年朋友陸忠信，也參加他們的聚會。

1922年，李淵如女士在福州講道，有大復興臨到。在那年，倪柝聲從三一書院畢業。

1924年，柝聲似是患嚴重感冒，咳痰，夜間盜汗。經醫生診斷是肺病；在那時，肺病是不治之症，斷定他只有六個月能活。

倪柝聲與情緒低落和疾病夾攻之下，繼續奮鬥。同時，他有感動開始寫屬靈人。陸忠信幫助他搬到白牙岩，近和受恩教士的地方，以得到屬靈的幫助和照顧。

他帶病寫作不輟。有時，寫到精疲力竭，不知是睡去或昏暈過去；醒來看見和教士溫和的微笑，在關切的低頭看著他，對他說：“基督是得勝者！”或引聖經說：“那在肉身受過苦的，就已經與罪斷絕了。”或引保羅的話：“祂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不要灰心，基督是得勝者。”

四個月之後，屬靈人完稿了。倪柝聲也快完了：人都看得出，他自己也明白，到了死亡邊緣。

李淵如來到和受恩教士那裏。她同幾位基督徒，為柝聲禁食禱告三天。倪得到三節經文，清楚來在他心裏：“你們憑信才站立得住。”

（林後一：24）“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林後五：7）“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可九：23）柝聲覺得主要他起來到樓下去。他走下二十五級樓梯，完全痊愈了！到了李的房間叩門，大家像見到彼得夜間出監，極為驚奇。

幾天後，他在主日聚會中，大有能力的講道三小時。

可能是經過李的介紹，柝聲借得蔡蘇娟家在牯嶺的別墅，趁冬天無人居住，他攜帶一箱書，一件行李，在那裏休養進修了幾個月。

以後，他下山到南京，幫助賈玉銘編寫靈光報約九個月。南北軍閥戰爭中，南軍進入南京，靈光報在火光中燒光，倪又再南下。

1928年五月，柝聲決定移到上海。在那裏，李淵如大姐和他同工出版基督徒報；後停刊，改為復興報出版。

到上海後不久，他因為修訂屬靈人，靈性有新的突破。這是因為罪的問題，纏繞在他心頭，等他重讀羅馬書第六章時，在第6節：“因為知道”：知道我們“在基督裏”（林前一：30），知道“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加一：20）這使他成為“十字架的人”。

同年，和受恩去世了，年六十四歲。她在中國約四十年的工作，造

就了陸忠信，繆紹訓，王載，倪柝聲等人，對於中國教會，有深遠的貢獻。除了她美好的品格，她沒有甚麼留下，只把她用的聖經，留給了倪柝聲。

在上海南陽路，後來到哈同路，倪柝聲，李淵如，汪佩貞，王約翰（連俊）等人，同心合意，建立起他們理想的地方教會。人數漸漸增多，原來只能夠容四五百人的禮堂，常擁擠到一千人。他們出版了自己的詩集，稱為小群詩歌。從此以後，“小群”成為代表他們的名字；當然不都是羊群。

倪常說：教會是神從世界召出來的：“祂救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祂愛子的國裏；我們在愛子得蒙救贖，罪過得以赦免。”

（西一：13-14）跟隨服事“勝過世界”的主，也就是得勝者。

1932年十月，倫敦的弟兄會，帶著英國，澳洲，和美國的弟兄會代表，來到倪的聚會。他們印證上海的工作，並堅邀他說：“你必須來英國，那將是我們極大的福分。”

倪說：“我可以去；但那不一定是你們的福分。”

次年，三十歲的倪柝聲，第一次出國，到了英國。他們接待甚為友善親切，帶他參加許多聚會；但他自己也參加了不是他們帶他去的聚會。柝聲發現他們有屬靈的自滿和狹窄。臨別的時候，他們問對弟兄會團契的意見，倪坦白的說：“你們有奇妙的亮光，但噢，那麼少的信心。”這年輕人講這樣的話！而且是中國的年輕人。

柝聲覺得傳福音的重要。他不僅自己傳，不僅鼓勵信徒這樣作，更訓練他們去作。他的講道不僅是聖經的奇妙知識，不僅是口才動人，更是以訓練信徒，建立教會為目標。

來的人多了，有各地的人，有為各樣目的而來的人。

1934年十月十九日，在杭州查經會之後，倪柝聲同張品蕙結婚。新娘是燕京大學文學碩士；他們在十多年前，在福州就相識。那時，品蕙還未信主，只是跟著跑；信和不信的不相配，當然不能考慮婚事。現在，他們終於排除困難成婚了。

婚後，雖然遭受各種攻擊，二人同甘共苦，經過狂風暴雨，終生相愛不渝。品蕙只受孕過一次而流產，以後未再懷孕生育。

不久，倫敦弟兄會來信，指倪在信仰原則上妥協，終止與他們的團契。原因是柝聲曾參與史百克（T. Austin-Sparks）的聚會。史百克原為榆樹街（Elm Street）浸禮會牧師，因教會真理意見脫離，創立了基督徒團契中心（Christian Fellowship Centre, Honour Oak Road），在南倫敦，同為弟兄會信仰。不二十年間，已經有七十個國家地區，有同樣團契。上海“小群”領袖們，一致同意接納維持與史百克的團契。

倪柝聲主張，教會不應有聖職人員和平信徒階級的分別，所需要的是：“先有神面前的負擔，才在人群中間工作。”因此，受過訓練的信徒，紛紛外出傳揚福音。

那時中國的教會，很多是“吃教”的人，信徒不明白重生的真理，教牧多是仰洋人鼻息的雇工，所以教會死氣沉沉。

但國內外虔誠的信徒，為中國教會的復興禱告。

神在祂自己的時候，興起了古約翰（Jonathan Goforth），丁立美，賈玉銘，和宋尚節等人，在各處燃起復興的火，許多人得救了。“小群”的及時興起，似是一陣清新的風，頗吸引了些有追求的信徒。

到1937年中，小群有一百二十八人外出建立教會。這樣，國內的其他教會，指責小群的“偷羊”。其實，問題在“羊”是活的，如果羊圈不修，或沒有供應餵養，羊難免走失；倒該感謝主，他們不是走失誤入歧途而喪亡。

同年七月，日本挑起侵略中國的戰爭。戰火延燒到上海。不僅國遭侵入，柝聲夫婦的家也遭波及。柝聲計畫去倫敦，就在這時，經過香港，把品蕙留在那裏倪父母的家中，他單身乘船往英國。

到埠之後，史百克伴他同去參加凱綏克培靈會（Keswick Deepening of the Spiritual Life Convention），倪恰被安排坐在日本講員的旁邊。當被邀領禱告的時候，他說：“不為中國利益禱告；不為日本利益禱告；而為了神子的國度在中國和日本而禱告。”

回到上海，倪柝聲講禱告的重要。他告訴會眾，叩門不是叩牆，正像尋找有特定的目標，禱告也是如此。

有一天下午，倪夫婦被邀去參加一個茶會。一位宣教士送一個包裹的禮物給品蕙。她打開一看，驚奇的發現，竟是他們失去的結婚禮物：一本聖經。

問她如何尋得的，那宣教士說出一個奇妙的故事：

一位返愛爾蘭度假的宣教士，在一個聚會中傳信息。當她講到中間，她表示：“如果有一本中文聖經，會幫助我解釋得更清楚。”有人把一本中文聖經交在她手上。打開一看，裏頁用英文寫著：“Reading this book will keep you from sin; sin will keep you reading this book.”（“讀這書會使你遠離罪；罪會使你遠離這書。”）用中文寫著：“柝聲給品蕙”。現在物歸原主，二人深深感動並歡喜。

原來有個在上海服務的英國兵，當日軍入侵的時候，他也趁火打劫，進入民家希望能有所獲，看到這聖經，拿回英國，給父母作紀念品。現在，奇妙的原璧歸趙。

在那時候，中國有信徒“走信心道路”的說法，也叫“憑信心”，實在就是獨立教會的風氣之先。這很難下一個準確的定義是甚麼，如果說不是甚麼，反而容易，就是：非宗派。當時大部分屬於宗派的教會，行雇工制度，傳道人是差會下面的雇工；信徒不知道應該工作，也不受鼓勵去工作。有生命的信徒也有工作的心志，但“聖工”是不准他們摸的，以致引起平信徒的不滿；在宋尚節等奮興佈道以後，更是如此。為了尋求屬靈的突破，他們只有憑信心出去事奉。不過，他們沒有經濟上的支持，處境常是困難，在邊遠貧窮地區更是如此。

這種“憑信心”的事工，有些像遊行的戲班，沒有固定的收入，愛心奉獻所得，要看領導者的聲望與能力，並信徒的反應而定，頗不穩定，而下面次要角色輔助的“苦哈哈”，往往生活在貧困邊緣。理想的方法，是信心的機構，統籌對各同工有合理的供應和照顧，無論叫甚麼，總是類似薪給制度。

那時，倪柝聲領導的地方教會運動，已經在全國各地急速發展，需要經濟上的支持。柝聲夫婦一同禱告，他以為尋得了解答：但他始終不能確定那是神的引導。但可以確定的，是這決定帶給他後來更多的苦難。

1942年初，生化藥廠在上海開始，由他研究化學的二弟懷祖主持廠

務，柝聲負責。標識是：“可以生者而生生；不能化者而化化”。教會的同工俞成華，陸忠信，陳則信等，同去倪家質問他：“為甚麼離開神的道去作生意？”倪的答覆是：他仿佛一個寡婦，為了養活孩子們，出去工作。

俞成華認為他是叛道；有人說他手扶犁頭後顧；大家都難過，擔憂，流淚，禱告。但柝聲意志已決。負責弟兄們顯然不同意，判定倪柝聲不配在哈同路教會講壇事奉。他接受了。

柝聲和他的弟弟懷祖同行，越走越遠，進一步把生化藥廠內移到重慶。在那裏，成為有規模的藥廠。柝聲忙於主管事務，同時照顧需要的主內肢體。

在那時，倪親密的同工李常受，在煙台教會的工作頗有發展。他傳講世界的虛空，再講“交出來運動”，鼓勵信徒把財物交給教會。後來，引起日本憲兵隊注意，把在李家中查出的財物抄走，並嚴刑拷打，狀況淒慘。經過託人賄賂關說，才得到釋放。為此，遭受物議，李也精神失常，經長期休養漸漸復原。適上海教會邀請他去講壇領導，就趁機離開傷心地煙台。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倪柝聲夫婦回到福州，買下陳家十二間排的產業，經過整修擴建，開始工人訓練中心的工作。

1946年，經過李常受的聯繫，哈同路教會再請倪柝聲回上海領導。

於四月間，倪開一系列的查經聚會，並恢復主日講道，會眾甚為踴躍。不久，為需要而進行擴展，建造可容四千人的新會所。不過，倪所著意的，是福音的擴展。他號召“交出來運動”，會眾熱烈奉獻；繼而是高瞻遠矚的“福音移民運動”，把信徒家庭，移往內地福音未遍傳的地區。結果，新教會建立了二百多個，一時全國共有四百七十多地方教會。

內戰將結束，上海局勢改變。倪柝聲於暴風雨來臨之前指示：李常受去台灣；陸忠信往新加坡；繆紹訓往馬尼拉；陳則信往香港，繼續工作。倪則自己準備面對苦難。

分散各方的跟隨者中，李常受才能最高，發展最快，但野心也最大，漸漸把“地方教會運動”，帶領得偏離倪的道路，也偏離聖經的道路。這帶給倪聲譽上相當的損失。

1952年四月十日，倪柝聲為當局逮捕，被控各種罪名。從此，他未能再得自由。

二十年後，1972年六月一日，傳出倪柝聲離世的消息。

倪柝聲身高六呎以外，不比一般洋人低；相貌英俊，口才優越，思想穎慧過人。他的文筆超奇，在二十一歲的時候，即完成屬靈人著作。書中靈魂體三元論，有諾思底（Gnosticism）的意味，諾思底主義把人分為靈，魂，體（*Hylics, Psychics, Pneumatics*）三級，對於信徒的操練謙卑敬虔，未必有大幫助。在此之外，有工作的再思，是對教會論著影響最大的一本書；經他自己翻譯，略經英國同工編修，深受英語教會歡迎。其他的著作，也有很多被譯成英文流傳；還有很多的論著，和期刊的文章，講道紀錄，大部分能夠供應教會，反對他的人也會引用，跟從他的人則奉為經典；“倪弟兄”講的，寫的，不容有誰懷疑。還有許多新語詞，新觀念，也進入華人教會詞彙，使用者每不自知。例如：

“亮光”，“看見”（作名詞用），是前人未有的；“釋放”信息或神的話，其實“神的道不被捆綁”，何需，亦何能釋放？但用者以為如此說是屬靈，以為新鮮，習而不察。

不過，最受疵議的，是他有關教會的理論，初期的“離宗派運動”，則不僅為宗派中人深痛惡絕，非宗派者也能夠看出其非持平，也難以算得是周全無瑕，而且不能付之實行。不過，在反對的人中，能夠寫出講道明理文章的，除了黃漁深而外，其人不多；所容易作得到的，只有出之詆毀，這是可以理解的。

倪柝聲當然不是完全人。其一度經營生意，最為我人所詬病。不過，轉而經商的不乏其人，但以後能夠像他一樣徹底“交出來”的，則難以找到第二人了。他真是如清教徒所說，脫去了衣裳；而不是為自己居積，走巴蘭的道路。他一生服膺和受恩教士的話，作十字架的人。他常說：“即使你證明你自己對，顯明弟兄不對，那有何好處？”又說：“如果對知道你的人，用不著辯解；對不知道你的人，辯解也無用。”我們對人不知道的可太多了，要等到主面前，才可以全知道。

倪太高了些。有話說：“出人頭地的人，容易被砍頭。”在教會其必也如此乎？

附錄：

我看批倪事件

多年前，我參加一個有關莎士比亞的討論會。據那位講員說：不要花時間去讀那些助理教授所寫的論文；因為他們猴兒急，在 publish or perish 的壓力下，想要晉升副教授，儘想些新奇而缺乏學術水準的文章，能引起爭議更好。於是各種競新務奇的怪論，紛紛而出有些簡直是荒謬絕倫：甚麼莎士比亞是同性戀，或提倡同性戀，無所不用其極；因為他們把莎士比亞當作是好萊塢的同類，甚或跟他們一樣，怎也信不下那劇作家會是道德教師。

可惜，華人神學院還更沒有教授考銓的制度，弄個甚麼學位，從教室出來，再踏進另一個教室，就變成教授。不過，教會的道德水準和自律，應該更高一些；至少希望常是如此。

可是，事有例外。

今年是倪柝聲一百年誕辰。教會用不著從俗特別慶祝，但至少依中國傳統文化，也不是再把逝者揪出來批鬥的時候。不過，這樣的事到底發生了。

中國香港某神學院，有一名教授，寫了一個單行本，講到倪柝聲的事。那書照舊俗類分，可歸於“扒糞文學”，品流極低，本不值得作

評；不過，有的同道，看不過去，也為免於弟兄姊妹被矇騙誤導而跌倒，才不得不講幾句話。匿名的黑信本不是好事；神學教授公然寫那種類似黑信的書，求名而不隱其名，是更不好的事，因為至少該考慮到給神學院帶來羞恥。

不是我故意咬文嚼字，倪柝聲的榮辱升黜一書，單這題目就引人起疑：他不僅肯定“辱”跟“黜”的事實，而且“黜”是官場中貶降的意思。誰升過倪的官？誰貶過倪的職？嘔，他在想些甚麼！此書的客觀性，豈能不加個“？”！表現出此君連寫封信的能力都值得懷疑，還高談啥研究？

他作了多少研究呢？其“自序”說，“期間經歷了近十年的時間”，底封說“期間經歷了近八年時間”。二年時間可以渾蒙不清，其內容如何，不問可知。事實含糊，說理不明，到可驚的程度；你自己不認真，哪能叫別人認真對待？

且看其成果如何。

作者說他是：“用愛心說誠實話”；“但對於讀罷而義憤填膺的人，我的研究便肯定是有價值的了。”（頁 viii）原來此君是以激動人的情感，而定其價值標準。治學如此，只有請為坐在他腳下受教的人禱告了！

神學家跟歷史學者不是一回事。華人教會過去唯一的神學家是章力生，現在還在等待下一位神學家的出現。但寫史則不同了。春秋史筆，褒貶都有原則，不可率爾操觚。這是作學問的人該留意的。至於基督徒，在立論新穎之外，還必須求真；因為這是“真理之子”的責任。不知道而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在學術上必須避免，在為史上更是深忌。

但他真知道甚麼是“真”，如何探求嗎？

他在“自序”中說：“求真是治史的第一原則，這是無須辯證的。”（vii）說得好。但該如何“求真”呢？就值得辯證了。治史是就已有的記錄和資料，研究以達到了解當時最接近的真實。不過，作者所求的是甚麼樣子的“真”呢？他採信“控訴”的“反革命罪行”和合意的資料，而對屬靈的“空洞與虛偽感到強烈的惡心”，這是他的先入之見。他甚至違背聖經記載的事實，說“耶穌基督總是迴避耶路撒冷及聖殿”，忘記了主面向耶路撒冷，並在那裏被釘十字架呢（vii）。

再說，在學術研究上，原始資料與次要資料的分別運用，這原是常識。所以，負責任的作者，必然像路加醫生一樣，“詳細考察”（路一：3），不好道聽塗說，或隨便摘拾抄點資料，並倚仗官方的指控，就付之剞劂，不僅殃及棗梨，也誤導讀者。此君的習慣是凡有利倪的事，就於腳注中說：“不可相信”，或“避重就輕”等類的話；凡有利被控者的話，就當作聖經真理接受，根本不是治學的態度。

他所選擇羅織的“罪狀”，說“背叛祖國的反革命分子，祖國人民最兇惡的敵人”倪柝聲，

（罪狀一）盜竊國家軍事機密情報…

（罪狀二）協助美蔣散播吸血蟲禍害…

（罪狀三）慶賀或鼓吹美蔣對上海的轟炸…

（罪狀十一）誘騙信徒遷居台灣。“他們利用宗教，在解放前夕，誘騙

了很多青年教徒離開他們的親人到台灣去，至今這些人還在台灣過著水深火熱的日子。

台灣即使缺乏政治自由，在信仰和道德上低落，但說人家是“水深火熱”，還不算公道。看他多麼有興趣這類奇聞！多麼令人齒冷！

身任教席的人，特別是神學院的教師，是教牧的師表，更不說必須相信有神，而對神負責了；就是要根據資料與廣收慎選，不可偏斷，治學的嚴謹態度，也是萬萬少不得的，否則以盲引盲，真箇不得了。說到治學為文的基本紀律，作者是福音派神學院的師傅，又是學者，該都知道。至於涉及於別人品德名譽的問題，更要謹慎，自不在話下。

還要知道的，是好話少人相信接受，壞事很容易叫聽的人接受。因為“人的心中所存的，口裏就說出來”；因為心中的污穢，容易相信壞事，傳揚壞事，更壞的是不經證實的壞事。

倪柝聲其人早逝，當年教會受迫害，鬥爭，創深痛鉅，教會當時忍耐，事後赦免，對那些造分裂，受打擊，雖不存怨報復，也都不願再提。哪輪到當年恐怕還未出生，即使生了，也還不能分辨左右手的人，出來說話？

現在的中國，已經撥亂反治，雖然未達到完全的地步，但顯然的日有進步；許多昔日冤獄的基督徒，都已經平反了，有的還得到相當的賠償。倪柝聲卻在獄中殉道，未能等到平反；他生時沒有兒女，含冤入獄，至今也沒有兒女為他平反。到一個程度，竟然把不起訴的長期羈押“直到1956年才被起訴判刑”（頁4），也當作是倪的錯，當作先假定有罪的憑據，而為違反人權叫起好來！

案：羅馬法系早就規定，非經證明有罪不能以人為有罪；非經定罪，不得施刑。現在基督教的神學教授，居然先假定倪有罪，要求證明無罪；大家都知道，這在法律技術上，幾乎是不可能的事。而對於其屢遭非法刑掠，反無一言。豈不怪哉！

死人不會說話。但活的人，不該把動亂中“鬥爭”“控訴”羅織的罪名和捏造的“證據”，當作立論的根據，用以對付主內的肢體。這是追貶的鞭屍暴骨行動，即使非基督徒，也作不出。其荒唐程度，叫人以為是所有的改革，都成空談，不幸紅衛兵復出，作反基運動的馬前卒子。

清算主內的肢體，即是羞辱主；保羅在大馬色的路上，聽到主說：“掃羅，掃羅，你為甚麼逼迫我？”（徒九：4）那時，掃羅只是迫害主的門徒，並沒有迫害耶穌；但在天上的元首為祂受苦的肢體說話。不過，保羅那時候的“褻瀆神，逼迫人，侮慢人…是在不信不明白的時候作的”（提前一：13）。神體諒他的無知，向他施憐憫。但明知而妄為，還算相信神的人嗎？坐在位上作師傅的人，為何作出這種事，為不信派，作傳聲筒，應聲蟲？實在令人不解。

教會中人，是一個身體，而互為肢體；即使不能同肢體受苦，至少也不應該隨意架誣呀！

且說那本書的資料，並沒有甚新奇，只是多年前鬥爭控訴的翻版，特別“暴露”倪的“淫亂”；其實，誰都知道，他沒有時間去作那種事，如那“扒糞手”不怕污穢所寫的。犯罪的人，通常是掩蓋唯恐不及；不可思議的，書種竟然說是他錄電影片“留念”！對於這些事件，

如果實有其事，有心人想按圖索驥，找幾名當事人作證，豈不更加真實？並沒有，連一個也沒有。約翰福音第八章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捉了行淫被拿的婦人，並不試行“捉雙”，現今的宗教人，採證的態度，也仿佛師承有自。再說，誰都知道，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攝影機笨重得狠，出門攜帶，非常困難；誰會用成隊的技術人員，在嫖妓時拍相？如果所謂學者連這種事都可採信，恐怕還會相信地球是用牛馱著的。又說，倪藏有大批的淫書，蓋印為證；實在說，還未曾聽說，有誰願意留下這種“遺產”。

至於說，自己製造犯罪記錄，照犯罪心理學研究，只有不正常的人，反乎常識和人性，才作得出；如果他那麼不正常，必然不能作領袖。

該書作者最愛使用“政府”，“證據”一類語詞。仿佛是搬“政府”來嚇唬老百姓；他自己則煞像政府人。其實當年的“政府”，並不同於現今的政府，而且沒有一個政府不曾發生政策錯誤。至於暴民亂政，他也會奉為權威，簡直豈有此理！所謂“證據”也者，其實比作者年長有知的人，誰都知道，當年發生過些甚麼天方夜譚般古怪的事，如：大白菜重一百二十斤，母雞每天生三個蛋。著者甚麼都採信，就是偏不相信教會的話，好像是“在善上愚拙，在惡上聰明”。當然，我相信他不是小孩子。

那作者又愛對顯然未見過的事，憑猜想就斷以為真；其實，witness一詞，源於 *wit*（就是眼見的意思），他既不曾見，如何能夠證？至少也該考察，找一兩名可信的見證人出來啊！不，他一個也沒有。荒唐以至於此！

依法律定罪，需要有犯罪的證據。沒有誰需要證明自己無罪；證明無罪是非常困難的。定人罪的時候，才需要證明，而且要無可以懷疑；如果有可疑的時候，寧可信其好的一面。這是現代司法極普通的作法和常識。教會更應該如此。至少要憑兩三個見證人的口，還要給被控者有辯訴的機會。否則逕予定罪，是不合理的。

論到倪柝聲對其夫人張品蕙的深愛和尊重，幾乎是盡人皆知，而以為美談：少年相識，經十年分別，而後結合。如此的相愛相敬，哪容背後另有外遇？在人慾橫流的今代，也許不是常事；但用情有專，相交不亂的人，想必都能領會。

再說，教會知道他的為人如何，最跟他接近的人，並沒有誰說壞話。而聚會處不是他個人的，犯錯教會有紀律行動。

不過，倪並不是聖人，他犯過錯誤。在早期曾被停止過主餐（他們叫擘餅），後來，在生化藥廠的事上，他禱告過，卻從沒有說過清楚明白是神的旨意。不過，他的存心可諒，是因為教會迅速擴展，需要固定的經濟支持，用他自己的說法，如同“寡婦有子女須撫養，不得已而再嫁”。不過，教會的長老俞成華等人，還是停止他的事奉，直到他回轉再被接納，而且仍然是第一把交椅，正像彼得跌倒並復原之後，依然是門徒的領袖，教會的柱石，這顯明是有其非凡的品格。基督徒該知道誰都有錯，而給人第二次的機會。可惜，倪書的著者缺乏這種風度和屬靈修養，專挑人的錯，不論人的成功。

倪柝聲不是耍嘴皮子的人。他的屬靈著作，影響廣而深，不僅在華人中流傳，有很多且翻譯為外文，其深度極為洋人推重，列為世界傑出

的基督徒。

他的著作屬靈人，頗有可評。把靈魂體的三元論，變成了三等論，有些諾思底主義（Gnosticism 或稱“靈智派”）的味道，來源不明。我無意低估倪柝聲或批判他的某君，但他們顯然都不可能見過 1945 年出土的 *The Nag Hammadi Library* 也不似有對希臘文譯為 Coptic 文字有足夠的應用知識；何以類似？我們只能說“不知道”。不過，孔子似陽貨惹過麻煩，但並不是錯。所有在這方面捕風捉影的濫加批判，欺弄外行人，不僅是沒有意義的事，也跡近於不誠實。

工作的再思一書，極引起爭議。只是，他批評的消極方面大部分都對了，地方教會的原則，卻難以被普遍接受。其中黃漁深的從哈同路到南陽路一書，駁倪書的立場，所論中肯而筆鋒說理都高明，甚至超越倪著；再有王明道，也是不同意他的人中之一。但這些人，辯理甚至爭辯，分開，卻都沒有對倪作人身攻擊，都沒有指倪在生活和品德上有問題。

更荒唐的是，著者連別人不說話，都當作倪犯罪的證據：他引用陳則信這樣一段話：

他（倪）有沒有犯過這些罪，我不知道。不過有一件事我知道：從前我沒有得救，感謝神，藉著他我已經蒙恩得救了；曾有一度我屬靈的情況相當低落，感謝神，藉著他我被帶進很大的復興！我一生蒙主藉他帶給我的屬靈幫助，可說沒辦法計算，這是我所知道的。（頁 138）

我們可以看得出，這是仿照約翰福音第九章瞎子蒙恩復明的見證，只說他所知道所經歷的事；在見證原則上是正確的，在語意上是稱讚。那復明的人說：“他是個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從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見了。…我們知道，神不聽罪人，惟有敬畏神，遵行祂旨意的人，神才聽他。”（約九：25,31）以上所引陳則信的話，正是跟蒙恩的瞎子所說的相似。如果連這個都看不懂，問題就大了。只是法利賽一等的宗教人，不滿意這樣的見證，如果今天仍然如此，也不足為怪。批鬥倪柝聲的作者，竟然詆毀是“捏造事實”，卻說不出理由，只可惜為時已晚，不能把說真話的人，都趕出會堂。看來如果作者當年在耶路撒冷，也不是不可能作出同樣的事，甚至釘耶穌十字架呢！這真是如同主耶穌所說的：“我為審判到這世上來，叫不能看見的可以看見；能看見的反瞎了眼。”（約九：39）這話多對！那些人也多可憐哪！

想不到在倪柝聲離世三十年之後，昔日的同工，有少數還在世間。怎麼說也輪不到晚出的人，既沒見過其人，又不加慎思明辨，去蒐求原始證據，就採信不信者構陷的資料，妄加污蔑。其人對對倪有利的見證，不加採用；對其屬靈著作，不予正面的引述，如同不存在，是何用心？

所有的華人教會，包括反對“小群”的人，也從倪的著作得造就，甚至他們所用的語詞，很多是倪所創用的。單是這一點，飲水思源，就不應輕易對倪加以侮辱。何況照華人的倫理傳統，對長者應當加以尊重，至少不可以訐為直。現在卻有人再來套用紅衛兵的作風，而且是教會中人，實在是不該有的現象。本人依對晚輩寬厚的原則，不揭露作者

的姓名，為的是給他自新的機會，並不是有別的避忌，希望作者讀者都諒解。

古人說：智者要避三鋒：武士的劍鋒，辯士的舌鋒，文士的筆鋒。不過，鋒要正當運用，為出鋒頭，頗乏可取；用以對內，大不像話！

人類歷史上第一宗刑事案件，是兄弟相殘，哥哥該隱，動手殺了弟弟亞伯；有人認為最可能致死的武器，是築祭壇的石頭，是多麼可哀的事。亞伯“雖然死了，卻因這信，仍舊說話。”（來一三：4）想想今天的批倪風波，何嘗不是如此！當年批鬥，令人遺恨無窮，到現在多已經平反了；如果倒行逆施，開倒車肯定錯誤，而作出這樣事的，竟然是宗教人；清夜捫心，何以為解？

這些話看來像是要教訓誰。但願基督徒作者讀者，特別是年輕人，要知道“偏聽則昧，兼聽則明”的常識，也有愛心和風度付之應用。明眼人都會知道，今天有人忽然作這種事，自然可能是為誰利用，即使為立功身不由己，未免巴結過火吧！

前面說過，我不同意鞭屍行動。“鞭屍”的故實，是伍子胥的父親，被楚平王冤殺；子胥投吳國，借兵復仇，入楚後，平王早崩，子胥掘平王陵墓，把他的屍首鞭撻三百以洩忿。雖然他負有殺父的深仇大恨，論者還是以為戾氣太重，不同情他的過分行動。中世紀類似的事，是英國改教運動晨星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 c. 1329-1384）逝世四十三年之後，羅馬教掘開他的墳墓，把屍骨焚燒成灰，撒在河中。當然，伍子胥不是信主的基督徒，羅馬天主教對付不同情他們信仰的人，都是敵方作的，史家也不給予好評。同是基督的門徒，絕對不該作出類似的事情。

我並不同意“小群”的道理，也從未入過群；坦白說，對他們成見是略有一些，卻頗乏好感。不過，小群到底也是信主的，不是敵人。那書作者政治氣味太重，似是在為誰講話，攻擊教會，抹黑教會。講公道話，以倪的才慧，如果投身入夥，其前程功名，會超過任何批鬥他的人，包括現在批鬥他的人，且會有升無黜，有榮無辱；只是他選擇受苦，而以身殉道。單這一點，就不容誰追貶，污辱。我們該立場分明。如果誰要爭辯，追貶殉道者，實在說，教會從無先例。

從這一事件，我們還思想：為何有人這樣作？該如何糾正或救治？對教會會有何影響？

我們先看作這類事的，到底是何居心？

多年前，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所作夢娜麗莎（*Mona Lisa*）在博物館展出。忽然，有一名狂徒，執刀衝上去，要加以破壞；幸而有人迅速制止，造成損害不大。從前也曾有人企圖用錘子擊毀米迦勒基路的 *Pieta* 雕像，損失也輕微，沒有問題的修復了。

這些作品，是文藝復興的瑰寶，為甚麼會有人想破壞？有的人就對藝術品用油漆“抹黑”。為甚麼有這類的破壞行動？

經過心理學家研究，是因為作得太近於完美，有人看了，覺得企不可及，自己比起來太醜惡了，必欲破壞而後快。

有位牧師指出，近年來華盛頓的名字少有人提起；好萊塢有的製片人，倒利用過這位品德超卓國父的名字，只是無中生有，憑空捏造出些艷事加進去，務求同他們差不多。這種惡風有甚麼結果？美國男孩子

們，本來臥室中很多掛華盛頓圖像，現在不見了，換成了袒裊裸體的圖畫，或是甚麼妖怪的邪星，要不就是醜惡的畫。青少年的犯罪率，也隨之高漲。這是缺乏好楷模的結果。

聖經說：我們基督徒“原是神的工作（作品，或傑作），在基督

耶穌裏造成的”（弗二：10）。聖徒存在的目的，就是彰顯神在我們身上的奇妙工作，使我們今日成了何等人。如果信徒不時時同主聯合在一起，隨從舊人舊性去行，就不能彰顯神的榮耀。在另一方面，魔鬼也致力破壞信徒的名聲，造成醜惡的形象，其最終的對象，是使神的名受虧損：“看，這樣的傳道人！這樣的基督徒！”這就像是亞捫人羞辱大衛的使者，意在於羞辱大衛（參代上一九：4-5）。

再從聖經看，舊約記載人的軟弱敗壞，是叫我們在律法的鏡子下，知道自己無望，而信靠主耶穌，接受赦罪的救恩。而在新約，則從恩典的光中，引我們看到因信稱義的一面。顯明的例子，是亞伯拉罕，大衛等人，不是看他們的軟弱，而只聚注意力於他們的因信稱義。在舊約中所見的羅得，幾乎是“乏善可陳”；在新約中，我們看到的是神從毀滅所多瑪城中，“搭救了那常為惡人淫行憂傷的義人羅得”（彼後二：7）。從這樣的靈裏，我們可以學習看別人的好處，並不是那麼困難。

因此，對於那些慣於說別人壞話的，要同情他們，憐憫他們，赦免他們，勸戒他們；並盼望他們悔改，接受主的恩典，也能夠經歷憑自己力量所作不到的義行。

保羅寫信給腓立比教會，勉勵他們說：

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若有甚麼德行，若有甚麼稱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腓四：8）

我們平常知道些好人好事，總說“值得記念”，並且會口碑載道。唐朝的楊敬之，愛才而公正，“生平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成為佳話。可惜，很多人願意藏人善，不說人的好話，只講人的壞事，訐人之短，而那些壞事，短處，常不是真的；更可惜的是，基督徒有的也這樣作。以致我們很少聽到建設性的好話，只是破壞；這不僅證明現代人的心，不常“思念”這樣的事，更糟的影響，是叫人的思想，被那些邪惡的事所佔據；所造成的破壞，是何等的大呢！

人口所出的，可以證明他心中所存的。主耶穌說：“心裏所充滿的，口裏就說出來：善人從他心裏所存的善，就發出善來；惡人從他心裏所存的惡，就發出惡來。”（太一二：35）

人的傾向，是看到比我們好的，就把他拉下來。聖經的教導，是看到好的就效法，見賢思齊。

我有個天真的簡單想法：如果教會裏的人，會實行愛心，用愛心說誠實話，說別人好話，復興就臨到了。

為甚麼呢？第一，這顯明是有聖靈的果子，是真實靈恩的表現；其次，好人好事傳出去，人就會樂於跟基督徒來往，接近教會，“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徒二：47）這是教會增長的古老驗方，而且是真正的教會增長。

你近來可聽見講別人好話的嗎？要知道，好話出於好人；如果沒

有，該考慮你是跟甚麼樣的人在一起了。
那麼，你近來聽見基督徒講別人好話嗎？

甘雅各

你可知道弗羅里達州高度第三的點是哪裏？很少人想得到，答案是一座長老會教堂的尖塔。弗羅里達是平原和沼澤地帶，最高點為海平面以上三百四十五呎(Walton County)。

珊瑚脊長老會(Coral Ridge Presbyterian Church)，是在勞德道堡(Fort Lauderdale)，教堂建築的尖塔，高達三百零三呎。在基石上大字銘刻着：“EXCELLENCE IN ALL THINGS AND ALL THINGS TO GOD’S GLORY.”(一切事作到盡善，一切事榮耀歸神。)這也是教會創立牧師甘雅各(D. James Kennedy, 1930-2007)品性的宣告。

在禮拜天上午，一個不足二十四歲的青年舞蹈教師，睡猶未足。當然他沒有想到去教會聽道。但不知怎地，他睡前原把鬧鐘放在輕音樂上，却播放出宏亮的講道聲：“如果你現在死去，神要問你：‘你有甚麼資格進我的天堂？’你說：‘我沒犯過甚麼大罪。’…如果你這樣子回答，你準進不去天堂。”

本浩斯(Dr. Donald Gray Barnhouse, 1895-1960)的聲音仿佛晴天霹靂，從收音機傳來。睡眠惺忪的甘雅各，坐在牀邊穿衣服，繼續聽下去。他清醒過來。就在那裏，他跪下認罪悔改，接受基督耶穌為救主。

兩年以後，雅各在靈命和真理知識上都有長進；他幫助教主日學，漸漸覺得主呼召他作全職事奉。那感動在心裏很強，在一個週末，經過禱告，辭去他原來的工作。首先，他告訴在聚會的那海德公園長老會(Hyde Park Presbyterian Church)牧師。牧師正是長老區會的宣道部主任，立即介紹他去清水宣道所(Clearwater Mission)講道，時間是在明天的主日。負責宣道所的老牧師，早就想於三個月後退休，見接棒有人，宣布即時離職。於是，甘雅各有了第一個工場。他相信：主引導，主必預備。雖然，月薪只有二百五十元；他原來的週薪是七百五十元，因為他是全美國最佳舞蹈教師。他在那小教會工作直到1956年八月。

那年八月二十五日，甘雅各與安妮(Anne Lewis)結婚。

甘雅各進入哥倫比亞神學院(Columbia Theological Seminary)受造就。那時的校址在喬治亞州亞特蘭大(Atlanta)。

畢業後，在 1959 年六月二十一日，甘雅各接受勞德道堡長老會的邀約：一個四十五人的小堂會，沒有自己的教堂，在一所學校的餐廳聚會；會友像是形形色色異教徒的總匯。他努力工作了十個月後的結果，只剩下十七人的大軍！

他惶惑，他羞愧，他禱告；但沒有後退。

在這時，來了一封信，是一位在喬治亞州 Scottdale 的神學院舊日同學司馬特 (Kennedy Smartt)，邀請甘雅各，去他所牧養的殷革塞長老會 (Ingleside Presbyterian Church)，作十天的傳福音。

到了那裡，司馬特帶他去“作見證”，就是探訪，一對一的談道，有效的，積極的引人歸向基督。

回到自己的教會，帶來了教會增長的秘密：牧者要知道如何作個別談道引人歸主，並教導裝備信徒去作。他迫不及待的同信徒出去：老基督徒，多年來有引人歸主的心願，只是不知道如何有效的實際去作；現在能夠實踐作得人漁夫，有無比的喜樂。人人興奮的出去，新歸主的信徒也結果子，教會人數急劇的增加。到 1960 年，正式會員增加到 122 人。原來聚會的學校餐廳發生了人滿的問題；青年聚會要在廚房裡，主日學在附近甘雅各家中上課。

這樣，“福音爆炸” (Evangelism Explosion) 開始了。

世界的人口在以倍數遞增，教會不能僅緩慢加增。初期教會的增長迅速，是因為一般信徒，普遍的引人歸主。因此，必須動員重生得救的平信徒，參與傳福音的事工，完成基督的大使命。起初的名字是“新平信徒探訪訓練”；後來，到了 1967 年，才正式定名為 Evangelism Explosion III International。其中的 III 表明三重目標：宣揚福音，造就信徒，教會增長。簡稱 EE；中譯名為“三元福音運動”。

EE 繼續發展，成為全球性組織，遍及一百六十多國家地區，每年引人歸主的總和以百萬計。

1962 年，聚會人數超過了二百人。教會成立了建築小組，着眼建堂的計畫。美國長老會國內宣道部買下了商業道的一塊地，有二英畝，是珊瑚脊長老會建堂的地址。起初的新堂可容五百座位；但迅即不足應用，加建教育樓；禮堂增拓了三百座位的加建；再加閉路電視。後來擴展到隔鄰的消防站，給他們建造新站以為交換。以後，只得在主日多次聚會：上午二次，冬季北方來的避寒客多則改為三次，特殊節日四次聚會。

1967 年，會眾達到一千三百以上；被認為全美長老宗增長最快的教會。各地教牧紛紛來信，請教教會增長的方法；來信太多，難以一一詳細作復。甘雅各於二月二十日，開始第一屆三元福音訓練講習班。約有四十人從各地來參加，為期一週。最後一天，是“一帶一”的實習。那天，教會的平信徒，要指導未有引人歸主經驗的教牧，自然不勝惶恐；有的教牧何嘗不是如此？有一位教牧，寄宿在信徒家中；主人請他來用早餐的時候，連叩房門不應，發現他原來已捲了行李，連夜潛逃，至今再無音訊！

EE 經推廣到全球一百六十多國家地區，教會紛紛採用，成為對教會增長大有貢獻。

從那年起，葛培理宣道學院 (Billy Graham School of Evangelism) 每年三次請甘雅各前往講授；共約有四萬多教牧先後受惠。

甘雅各不以爲是自己的成功，他常說：“你求告我，我就應允你，並將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難的事指示你。”（耶三三：3）。

珊瑚脊教會，發生了問題，教牧和信徒最歡迎的問題：原有的建築，經過多次的擴修增補，仍然不足應付會眾增加的需要。

1974年二月三日，名建築師華根納(Harold Wagoner)設計的輝煌新堂落成。地點在聯邦公路上，取其聚會者易於尋到；堂址佔地十英畝，那時的會眾有三千多；但很快就看見有必要增購鄰接的五英畝，以應停車場和日增的事工需要。葛培理在奉獻典禮上講道說：“如果誰能夠找着一個謙卑的長老宗信徒，我就像摩西一樣，當作是大異象，走近去看。”他提醒會眾記得：他們幾年前只有四五十人，“相信禱告，相信傳福音”，蒙神賜福，成爲二十世紀神國的景象；他們也有促進一般教會增長的責任。

會堂的管風琴，是世界著名的大師碧施(Diane Bish)設計，在意大利定造，是當時所有在美國歐洲風琴最大者；有六千六百銀管，大者長四十呎，小者只如鉛筆。碧施在司琴外，還主持每週半小時的電視節目“喜樂音樂”(Joy of Music)。

教會在繼續增長。會眾迅速到了一萬；冬天從北方來避寒的“季候會眾”，更難數計。三千多的座位，難以容納，又再出現了多次聚會。

珊瑚脊事工(Coral Ridge Ministries)，有廣播“珊瑚脊時間”(Coral Ridge Hour)每週電視節目；還有“真理使人歸正”(Truths That Transform)廣播節目；經過各大洲成千的電台和海上轉播船隻，不停的播出福音的信息。

事奉的目標高：“人生的目的是榮耀神，永遠以祂爲樂。”

事奉的範圍，已經擴展到廣闊的大地。

現在，該想到深度的問題：主日學的人數超越了一萬二千，成人也在內，感謝主，那是很成功；不過，主日以外的週日，孩子們受的是甚麼教育？公立學校似乎是致力於傳播反宗教，反道德，和無知。爲了下一代的靈魂，應該作些甚麼？結果，是威斯敏斯特學校(Westminster Academy)的建立。爲了榮耀神，造就下代的永恒事工，注重信仰，並在學術上認真。五年內，成爲獲得南部地區院校協會(Souther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Colleges)承認學分的第一所教會學校。1973年，第一屆畢業學生只有八名；增長到有一千五百名以上的K-12學生註冊入學。

接着，音樂學院(Coral Ridge School of Music)成立。1990年，更成立了諾克司神學院(Knox Theological Seminary)；不僅神學信仰純正，注重學術，並教授大眾傳播的實踐知識，布道，及社會服務等科目，成爲卓越的神學教育學府，裝備合用的工人。

在早期的事奉中，甘雅各遇到一位長老，教訓他說：“年輕人哪，我們長老會需要受良好教育的教牧！”說完，轉身而去。這仿佛是寇準聽到建議：“霍光傳不可不讀！”寇準回家，取漢書霍光傳讀，至“光不學亡(無)術”句，知道是指他自己說的，遂發憤向學。

這長老的良言，激使甘雅各隨時追求在知識上進步。他喜愛讀書，現在辦公室藏書豐富，如同圖書館；他博聞強記，講道從不貧乏；有時他可以背誦引用長篇經文，或整篇詩文名作，而不必看筆記。

1967年，正在教會增長繁忙之中，他報名參加了芝加哥神學研究院(Chicago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那學校信仰好而要求嚴格。他以三個暑假，在1969年修完M.Th.學位；碩士論文是“福音爆炸”，成為暢銷書，三版共售出百萬冊以上。就在那年，三一福音神道學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of Deerfield)，頒授給他榮譽神學博士(D.D.)學位，以表彰他的成就。

甘雅各並不自滿停步。紐約大學教育學院，有專在暑期修讀的博士課程。經過九個暑假的努力，在不影響事奉下，於1979年，年近半百的甘雅各牧師獲得Ph.D.學位。他不是為了學位而修讀，而是願以學術上的成就，證明神的僕人不必須是不學無術的人。這樣，甘雅各從此潛心進修，甚有成就，在學士後的學位是A.B., M.Div., M.Th., D.D., D.Sac.Lit., Ph.D., Litt.D., D.Sac.Theol.連榮譽學位都在內。

他絕不是那種徒以學位驕人，而無實學的人。各大電視廣播體系都訪問過他，或邀他參與辯論，每次都得勝利。一個譏刺聖經和基督教信仰是愚昧的人，同甘雅各作像保羅“戰神之山”的辯論，那人過後說：“花了忒多時間，只證明我是愚人！”在同ABC的節目主持人辯論，他能夠說：“撒穆(Sam Donaldson)，好好讀點歷史！”

當然，甘雅各不僅是能言善辯；他的著述豐富，而內容堅實。在教會增長的題旨外，尚有我為何相信(*Why I Believe*)，重生新始(*Beginning Again*)，明白全面真理(*Knowing The Whole Truth*)，及國之恥(*A Nation in Shame*)等數十種；並有出版的講章一千餘種。許多現代及以後的人，可以從而得到造就。

2006年十二月，他因心肌梗塞住進醫院，雖曾有進步，但終未完全康復，延至2007年九月五日，這位神重用的僕人，離世去見他的主。

楊美齋：拓荒者

在鄉村長大，受有限的教育；生性不善逢迎巴結。但他不受這些不利條件的限制，竟能夠往邊疆宣道。讓別人去邀功求賞，爭取去大教堂，得高名厚薪；他去到基督的名未被稱過的地方，只立定心志，討主的喜悅。

1889年九月十八日，楊美齋生在山東省平度縣西的馬郭莊。早年在鄉塾讀書，讀完四書五經後，通過了童生鄉試，未趕上考秀才，科舉就停廢了；又教了三年書。

1912年，滿清給推翻了，中國改成了共和政體，新建立了中華民國。這政治上的改變，對山東僻遠的鄉村，倒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不過，楊美齋這人改變了。

次年，他以二十五歲的年齡，去平度基督教浸信會的職務中學讀書。學生立志佈道團的丁立美牧師，到平度講道。楊受到聖靈的感動，皈信基督，奉獻自己為主所用。

1913年，楊美齋進了山東黃縣的浸信會神學校，1916年畢業後，被派往離家三里的鄰村古莊教會作傳道，並兼二十一所鄉村教會小學的委辦。他僕僕風塵，盡力服事主，常奔走遠近各村佈道，引人歸主；其中有搶劫放火的強盜，也有流氓痞賴，沉溺鴉片中的癮君子，因福音的大能改變，成為新人。這些是在艱辛道路上，歡樂的果子。

1920年九月，華北浸聯會在平度開會，徵求人往東北開荒佈道。楊在早年還未信主的時候，曾到過東北謀生；認為是神的引導和預備，就報名申請。竟然在二十一名申請者中，成為唯一被選上的人，奉差遣前往。

1921年四月，楊美齋踏上往東北的行程。他是不屬於宣教差會的本地宣教士。由於經濟缺乏，只得拋妻離子，自己單身前去。沒有親朋設筵餞行，沒有冠蓋列隊相送。他自己背著行裝，踏上駛往大連的船。

抵達大連登岸，為了節省旅途的費用，不是搭頭等二等客車，連三等也不是，是乘無座位的客貨混合列車，就坐在車地板上。車上不供應食物，得自備乾糧，在車上咀嚼著；甚至也沒有廁所，到大車站停留較久，可以下車飲水，用便所。經歷漫長的一晝夜，到了長春；改乘三等旅客火車，到了哈爾濱，作為他在東北的根據地，把真理的旌旗在這裏揚起。以後的十二年，這裏成為東北邊疆的福音中心。

初到哈爾濱，一切都感覺陌生。晚間，卸卻一身疲倦，歇足在一家小客店中。在這環境下，禱告，讀經；白天帶些福音單張，漸漸走遍市區，遇到合宜的機會，就撒下真道的種子。

幾天過去了，他漸能了解這裏的境況。原稱為滿洲的豐饒原野上，除了原有的居民以外，也有許多山東，河北等地來的移民，在這裏建屋營室，興家置產，開發自己的事業；這些人得到了從世界所願得到的，所能夠得到的，卻忽略了為永生的住處安排，卻不知積攢財寶在天上。他們的深心，仍然是飢餓乾渴，不知如何得到滿足。

有誰把生命的餅，分給他們吃呢？有誰把生命的活水，止息他們的乾渴？

在這塊土地上，許多人建立了他們新的事業，但有誰肯為主建立基業呢？特別是市外的鄉間，盡多福音未到的地方。

在未來東北前，他聽朋友說：有一陳仙舟，在傅家店開設一家小型肥皂工廠，原是基督徒。在此舉目無親的環境中，未始不可獲得些工作上的幫助。

二人見面以後，陳即堅邀去他廠中暫住，食息於斯，每天只付四角錢。於是，他去那裏，白天一同吃飯，晚間與店裏伙計同睡在一炕上，實在難以說得上舒適。

當時的哈爾濱，是一個蕪雜骯髒的都市。街衢大道，遍見馬糞垃圾，污物叢集。會值炎炎盛暑驕陽蒸晒下，穢臭不堪，中人欲嘔。一群群的麻蠅，在這裏滋生繁衍，到處侵擾結集。到用餐的時候，蒼蠅不待邀請就來先嘗，飛在饅頭上，蓋成一層黑色，而遺垢斑斑。偏偏這些吃的人，又都持家儉約成習，不肯剝皮；楊既是傳道人，為了“向甚麼樣的人，就作甚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林前九：22），不肯自己表示獨異。結果，染上了痢疾。

隨著時間的累積，病越來越重，超過所能夠支持的程度。他不得不到十二道街一家小醫院去求診治。及至見了面，才知道是一顏姓醫生所經營的，曾在黃縣浸會神學院同讀書。原是舊識，卻在七八年後，聚晤於數千里之外，自然甚為歡洽。服藥後，病即痊愈。看來真是“萬事互相效力，為要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經陳仙舟介紹，他又找到了製鹼的商人范鏡青，原是煙台的基督徒，每主日均停業敬拜神。經過商量，范欣然允借店面為聚會的地方。福音漸漸傳開，信主人數增多。約一年後，聚會的場所就感到狹隘不便。這些蒙基督恩召的會眾，迫切感到需要合宜的房子；於是，租定一所二層樓房，樓下作為聚集的處所，樓上為住處。嘗了救恩滋味的信徒們，熱心奉獻，裝置電燈，修整房舍，製作講壇，座椅，都是甘心奉獻。

次年，又增設小學，聘任教員；主將得救的人加給他們，達到一百餘人；選舉執事，增聘傳道人，並設立醫院一所，規模大為增闊。楊美齋被舉為牧師。浸會自山東派遣牧師二人，來為他行按立禮。這是1925年的事。

不久，浸會又差一美籍宣教士藍馬丁牧師，至哈爾濱協助事工。楊牧師仍領哈爾濱教會牧師，沿中東鐵路外出佈道，向左向右開展。

第一站是安達。所住的客棧，僅是幾座簡陋的土舍，污穢不堪。白晝街頭佈道，夜間疲乏而不得安息，因為臭蟲成群而出侵擾，五夜不能成眠。力瘁體衰，不得不分租俄人餘室，自己調理炊事。俄人見這華人衣履整潔，陳設床茵無不井然，顯然與眾不同，覺得奇怪。

在安達工作不久，只是播下福音的種子。後來證明聖靈確在動工，有人信主，漸漸長大。本來想繼續栽培澆灌，誰知才一個多月後，哈爾濱教會的執事們就來追逼他回去：同心同行的人沒有，後顧之憂發生了。

一個月後的哈爾濱教會，情形完全改觀，與他出發前大有不同。一片被拆毀的景象，成了荒涼之地。因為那位美國傳教人，帶來了幾百元錢，也就想掌握權柄，弄得會眾愛心渙散。楊牧師就誠懇而嚴正的告訴他：“這點錢你若是向神奉獻的，請拿開仍擺在祭壇上的手，不要想在上面有權柄；如果你認為是借給我們的，那麼，我們教會可以還給你！”可見傳道人只要在錢財上態度正確，站立得穩，教會就不會失落。

雖然如此，力求補治，但舊痕難復，會眾有一度改稱“中華基督教會”之事。但楊牧師堅守地方教會立場，只行真理，不討人喜悅。

哈爾濱的變故，稍微安頓就緒，他又再度踏上征程，背起十字架，走向鄉村和邊遠地區，為主爭戰。回到安達，找好為聚會的房子，請了一位可信任的同工負責，把主的羊群交託給他，就再往前去到林甸。

在那一百多里的路上，林樾巒岡間，有“鬍匪”出沒，搶劫行旅。所乘馬車，結隊而行，每車有槍自衛。幸蒙主的恩典保守，平安到林甸。從林甸，前進到明水，再到昂昂溪。遇到一信徒，甚是親愛，盡情接待。楊在他們家幾次聚會後，有些人信而受浸，人數逐增；遂為他們建立教會，請傳道人牧養。

從昂昂溪，循鐵路到齊齊哈爾，是一省首邑，有中國國內佈道會在此設有龍江支部。他下榻在大興昌旅社，是遼寧的一基督徒經營，准楊約人在房間內聚會。另有一位開雜貨店的曲掌櫃，原為掖縣浸會的信徒，接待他到家中。不久，在活活江流中，為六人施行浸禮。他們議組教會，也請得工人栽培。

前進到伏拉耳基站，遇到一位瀋陽的信徒，在工作上同心協助。神適時帶領一位煙台基督徒查經處的弟兄，游行佈道路經此地，遂留他在所租的房子裏，開始當地教會的工作。

楊牧師繼續到興安，博克圖，滿洲里等地，設立教會。

那時，聖靈在中國各地大大動工，普遍看到人心渴慕。特別在久處邊遠地區的人，對於主內同道，有陌生而深切的愛。

楊也沿松花江，自哈爾濱至佳木斯，開拓廣闊的工場。搭乘平底江輪，循江而上佈道，沿途每到碼頭停止，是他傳播福音的機會。

旅程的第一站是湯源。遇到一開西藥房的蒙古弟兄，熱心接待，召集人來聽楊牧證道。幾年後，成為興旺的教會。

自中東鐵路東行，到珠河縣。有一山東徐姓信徒，開設藥房，接受運來的證道書籍，代為向顧客分送，竟陸續有人明道信主。後來信者日多，不得不另租房三間聚會。後來有一地主信徒，染有吸鴉片惡習；經教會為他禱告，脫離煙癮捆綁而得自由。他有五六間近馬路的房子，院落也甚寬大，願奉獻為教會使用；於傳道人住宿及會客室之外，還可容二百人左右聚會。自珠河而東，到密山，開湖，復至馬橋河八站，設立了教會。再到小綏芬，見到主的大能彰顯，得勝那惡者，捆綁那壯士，建立起祂見證的燈台。

在這些日子裏，他經歷了神豐富的供應。那時，楊每月的收入僅有二十元，這點錢只夠他旅費的需用，其他食宿等，每到一地，都會有人接待，幫助他往前行，真如使徒時代一樣。可惜的是人忽略了他的需要，人限制了他工作的深度，沒有為這孤軍深入的戰士，作好補給，但神不忘記。神藉著信的人供應他，鼓勵他。

走，走，不停的往前走。在這方面，他是自由的，沒有教區，沒有邊界。他活潑的奮進著。行行復行行，循著通往叢山深處的窄徑，看炊煙起處，有三五人家，他也去佈道，居然也有人信主。他到了九站木陵，循鐵路支線至梨樹鎮礦區，那些礦工如果開口不是污言穢語，第二句話一定難以入耳。但福音的真光照入了黑暗的礦層，也改變了他們的生命。

從馬河橋，回到哈爾濱，冒著寒風大雪，帶著疾病歸來。教會的肢體們顯出愛心，盡意盡力照顧，使他享受主內的愛，疾病也痊愈了。

1831年，日軍侵據東北，蒙主保守，教會未受到迫害。

次年夏，楊返里省親。趕上松江氾濫成災，不能即返東北工作。他應煙台浸信會的邀約，在那裏工作一個多月，遂被教會留請。東北的教會，大致已經安定成長，可不必回去；神命定他在那裏十二年的工作，就如此結束。

煙台教會空有一座壯觀的教堂，但實在軟弱。他覺得有負擔，站在破口防堵。

煙台浸信會在當時已有三十年歷史，設有頗具規模的男女中學各一所，並有附屬小學；當地最大的禮拜堂，可容一千五百人；現在除了男女學生外，有二十多位會友，冷冷落落的聚會。每週只主日開門一次禮拜，過後關門如故。有執事一名；沒有司庫，由美籍中學校長自理。沒有傳道人。這樣荒涼的教會，仿佛是廢墟，使教會如此受傷的原因在哪裏？他不暇追問，毅然面對比開荒更難的工作，只有恆切禱告，藉著加給他力量的神，竭盡所能的為主工作。

首先，需要堅固那些剩下將要衰微的，幫助軟弱的人；藉禱告建立強固的堡壘，抵擋魔鬼攻擊，仰望教會信實的主。一次次的造就，勸勉，漸見效果。第二年，隨著大地春回，教會開始萌發綠色的生機：五十多人受浸加在教會名冊上，那些流離失散的羊群，也慢慢回來。會眾漸多起來，他又讓教會舉有恩賜的人作執事，結束一人執事的局面；又選出司庫，負擔管理神家財物的責任。

在這年夏天，默察當地教會的需要，邀請眾教會負責人，共商邀請伯特利佈道團，舉行全煙台的復興佈道會。但當地的教牧和負責人，蔽於成見，對邀請“瘋狂佈道家”宋尚節，頗有異議；甚至把聖靈大能，說是“被鬼附著的”。但楊牧在哈爾濱時，曾和他們共同事奉，看到工作的果效，自行其是，決定單獨邀請。

伯特利佈道團團長計志文，同宋尚節，聶子英，林景康，李道榮等五人，來到煙台。宋尚節每天講道二次。可容一千五百人的大禮拜堂，竟擠得滿滿一堂，講台上也坐了二百人，凡可坐可站的地方，都塞滿了。別的教會，雖然牧者們不贊成，不得飽足的羊群，各自紛紛來聽。“小群”領袖特威言恫嚇，盡心盡力的阻止，竟控制不了信徒。講道者竭盡心力，亦演亦說，時講時唱；聖靈大大作工，許多人到台前痛哭流涕，認罪悔改。主也藉祂僕人的手，使病人得痊愈，行了神蹟異能。這不僅是全社區都看得見的大復興，且進入人靈魂深處，工作功效長久：組成佈道團，由李繼聖任團長，許多青年人奉獻自己見證主。復興的熱潮，隨這空前的大覺醒，振盪了整個山東半島，歷久不息。

煙台工作既展開，楊美齋就返回平度原籍，舉家遷煙台居住。楊牧有兒女九人，但開始奉獻就陷入困苦，甚至再三進到當舖典當，卻從不告人知；大人可以勉強維持，對孩子們就養不能育；第一個兒子在他奉獻時夭亡；六個孩子都在貧困中相續離世。剝奪，剝奪，新的創痕，壓著舊的記憶。

到煙台後，大女兒患上了腸炎。他們不得不破例雇女佣照顧。老嫗受到主人和悅的對待，已經感覺意外，再到看到女孩子臨終的時候，歡喜的說：“主耶穌來了！”然後安然離世。安葬後不久，老嫗就自動接受耶穌為救主。

煙台教會的工作安定發展，也開展佈道工作。在牟平縣萊山鎮，福山縣古縣鎮，先後建立教會；繼之，在高町，和蓬萊的壩角村，也展開真理的旌旗。

他兒女中唯一長成的兒子好賢，曾被聖靈充滿，跟隨父親的腳蹤，奉獻到黃縣浸信會神學院修讀。1938年，好賢染上腸熱病，經中醫調治，漸見康復。後因飲食不慎再發，診治無效，終於逝世。楊牧得信後，並沒有告訴誰，同妻子帶幼女好靜，一同去黃縣處理後事。途中在兵燹後的荒僻路上，又遇見盜匪，劫去他僅有的幾元錢。途中在柳行村，晚間教會有聚會，還特請牧師勸勉。牧師講道的心情如何，可以想見。

到了神學院，看到的兒子是臥在棺木裏！師母悲泣號慟，年輕的孀妻愛惠，也極悲痛。不知為何楊牧師請大家選唱詩歌“自永遠到永遠，主的愛永不改變”。

神學院院長柯理培牧師，給他們找了一所小房子。一家人在這裏度過兩個多月的日子。

黑夜漫長的痛苦，從身上慢慢壓過。對神的工作不明白，使他的心中鬱悶沉重。屋頂上，牆壁上，似乎畫滿了問號???他像約伯一樣，巴不得在主面前“辯明所行的”。

他如同在瑪拉的拿俄米一樣，向寡媳愛惠說：“起來，回你的娘家去吧！我可以給你路費，一切你完全自由。”

但愛惠卻像路得一樣，抑悲回答：“好賢去了，我就是好賢，我願意終身在這家服事你二老。”她真的實行所說的話，直到服事公婆先後去世。

楊美齋關在小屋裏，不見客人，不受安慰，在與神爭辯，摔跤。那也是教會為他作難，不少人同心禱告，求神使祂的僕人再重新得力，剛強起來。

有天夜裏，他得了一夢。在夢中，他省察自己：雖然沒有明顯的罪，卻自義而不能諒解饒恕別人。現在，驟見自己的醜惡，在聖靈光照之下，認識自己由頂及踵，無一完全，無一處不是罪，都是污穢的衣服。忽然看見異象，見主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鮮血從釘痕中滴滴流下；心中對十字架無限愛慕，就親吻十字架；更感覺全身輕鬆非常，所有的罪都被寶血洗淨，真有重擔乍釋的快樂。多日沒有感謝了，今夜不自覺的流露出感謝的聲音。忽又感覺一股巨大的熱力，自上進入心中，渺小的自己，被主的愛融化，能夠愛一切的人，沒有隔膜透明的至愛。如此持續約一小時，遂不由自己的大聲讚美主，溢出充滿的喜樂。口裏說出方言，心靈清楚明白所說的，都是感謝讚美主的話，口舌卻不能自主，這種和諧悅耳的語音，用理性聽不懂，心靈卻能夠明白。何等奇妙！他的心中湧起浪潮和新歌。

妻子從夢中驚醒，以為是瘋狂或夢魘，用力按住他。楊牧說明原委，一同起來禱告。在心中有聲音說：“你孩子的死，是我所作的，於你有益處。”問題解決了，心裏不再疑問，甘心順服交託。此後，作夢也未夢見在天父家裏的好賢。

他曾寫信給煙台的教會，說是不再回去了。現在，知道自己的愚昧，再把自己奉獻在主手，聽主所用一並不是他出爾反爾，而是出乎己而反乎主。

天還未亮，他一家就啟程往煙台。

主的旨意真是美好。會眾都看出經過火煉的楊美齋，仿佛是新的人，柔和了許多，也堅強了許多。他對主的愛有更深入的了解，對屬主的人有更新的認識。有個椎魯不文的鄉下人，名叫郭鴻鈞，滿面麻癩，加上嘴歪。真箇是其貌不揚，言語粗俗；但在聖靈大能之下，滿面榮光，靈力奮迅，有一段時間，如此人物竟然與大名鼎鼎的宋尚節博士伴隨並駕齊驅，輪流講道，每次長達二小時，流出活水的江河，滋潤許多口渴的人。

不久，局勢由陰霾四合，而進入全面黑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教會在日本軍管理下。但時間不長，即恢復聚會；一度被捕的領袖們，也陸續釋放；只有聚會所的李常受，因聚斂會眾的錢財，被日本憲兵隊吊打刑訊，入夜慘呼之聲，達到戶外，鄰近的禮拜堂可以聽見，使信徒膽寒，不敢聚會；到他把信徒“交出來”的錢財，全部交出來，後來並經情託賄賂，才得釋放。但風暴過後，以後也就寧靜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似乎是國人受苦不足，內戰繼起，教會的困苦，延續了近十年。但在風雨飄搖中的教會，顯出忠貞的信徒，仍然結新果子；也顧念供應牧養的人。

1947年，楊牧師一家到了青島。因為房屋缺乏，他們住在差會所租房子的牛棚中，掛起麻袋暫充牆壁。想到主耶穌以尊貴的神子，生在客店牛棚裏，祂的僕人能為主嘗受苦的滋味，雖然嚴寒侵人，不是華屋美室，也就怡然。幸而不久有人他遷，才算是獲得寄居的房子。

1948年初，全國浸聯會在上海召開邊疆佈道會，想到了楊美齋牧師，來了邀函，並再加一電報，請他去參加。會中決定：派遣楊美齋牧師往台灣察看工場，相機展開工作。

在島上考察了一個多月，回上海報告，得到往台灣開始工作的許可。

於是，他把在青島的家眷接到上海，然後同船航向台灣。經過了三十六小時的航程，1949年二月四日，在基隆登陸。

上次楊牧來台時，在台北市仁愛路二段25巷內(杭州南路一段77巷29號)，覓得一頗為寬敞的日本式房屋，即決定買下，到四月裏，才完成讓渡手續。整修後，是浸信會在台的第一所教堂，部分作為住家。不久，中國大陸政局改變，難民難兵難官相繼湧來，人口增加。楊牧往高雄訪問，並領一週的聚會。因為在台灣有一未婚的老西教士，信仰雖然純正，但個性倔強，有頤指氣使的習慣；楊是不食嗟來之食的人，意見不免相左，同處不容易，因而有脫離現工場，以求清淨的意思。但晚間外出，跌傷左腳腕，送回台北休養約半年，才得復原；省察知道是神不願他妄行，也就安然處之。神也挪開那攔阻。

從海峽對面帶來的福音種子，他照神的託付散播，澆灌，已經發芽，茁壯，成為大樹，開花結果；接受他栽培的學生，成為下一代的使者，負擔繼起的事工。台北中正路1559號的新教堂，也已經建成並使用。

工作進展看來很快。楊牧師也衰老得很快。他病了。

對於了解他境況的人，這並不算是意外，這時才病倒才是意外。數十年艱苦生活，營養貧乏，入少出多，就是牛也會倒下去。如不是神的大能覆庇，怕不早就油乾燈殘，息了生命的光焰。再加心靈的沉重負擔，說不出的苦，造成寢疾的原因。

起初，只是漲發高熱，有時會消退；但身心疲憊，而迅速的瘦減。經過診斷，確定是肝病。但他不能卸下戰鬥，不能卸下責任；一到勉強能起來，就繼續工作，繼續登上講壇。結果又病倒了。一次，二次，三次，越來越難恢復。纏綿四五年，就是這樣朝暉夕陰，如同風雲變易。

1961年二月二十二日，一個風雨淒其的日子，他的病況突起變化；延至翌日下午四時四十分許，神的僕人楊美齋，息了他的勞苦，安息了。他重繭的腳不再奔走，升到主面前。

二月二十五日，遺體安葬在台北新店鎮碧潭之隈的一座小山上，等候他所事奉的主再臨時，復活領受他的獎賞。

筆為牧杖的楊濬哲

廣東省饒平縣，實在是既不富饒，也非平原。楊濬哲牧師就生在那裏的僻鄉。年紀稍長，他就立志向學，並離家往外發展。在汕頭讀書後，學了一些現代知識，一顆飛揚的心，更想遠行。十四歲就往上海，在那繁華

都市裏的一間商店工作。不過一年，在十五歲那年的春天，再轉台灣，經過香港，在同年末，去了荷屬爪哇的泗水，在當地的華文報紙作記者。

在那裏，趙柳塘牧師找上了十六歲的楊弟兄，勸他奉獻作傳道。不過，他雖然生在基督教的家庭，卻未信主重生。

一位蘇格蘭宣教士賓為霖(William Burns)，在潮汕撒下福音的種子。那是上一代的事。但神自己引導他揀選的僕人，不僅重生得救，還奉獻自己，於1930年，進入了梧州建道神學院的門受造就。僅一年多，翟輔民牧師即派他往越南工作。

楊牧師經歷奇妙，他的性向，也有些與眾不同。

開放而保守

從他早年的外向發展，可見他不固執守成。翟輔民牧師派他去越南宣道，他就欣然就道南行。才二十歲，翟牧師託付他主編聖經報，他就北上到上海。他本來想終生作文字工作，但因為水土不服，患病嚴重，一年後，只得南下到廣西牧會。

楊牧師一生只在兩個教會長期服事。一是廣西柳州的宣道會，並任建道神學院監督，華人宣道會聯會主席；共在宣道會工作十八年之久。後是香港九龍尖沙咀潮語生命堂牧師，前後約三十年；退休以後，仍然是榮譽牧師。

他任港九培靈研經會的主席，先後達四十八年之久，不僅是任期最長的，而且超過該會七十五年歷史的一半；並且每年都有進步，憑信心工作，經費從不缺乏，到會人數增多。他接任福音文宣社的董事長兼社長，也有十年之久。可見其事奉的忠心恒毅，絕不是為了搭橋登階，見異思遷。他任事認真，絕不作挂名的差事。事實上，基督徒自己求名，甚至嫉妒別人，是最不像基督的事。

合一而分別

楊牧師不是只逢迎領袖，效忠宗派的人。他討主的喜悅，服事主的教會，有寬大的心，願意與人和睦，凡主內的肢體，都能協和同工。

這個汕頭人，多年服事汕頭教會，卻全不是“山頭主義”的作風，關懷教會間的共同事工。

在香港，他倡導基督教文字事工促進會，基督教興學會，都是各宗派合作的工作，並且能夠藉一同工作而促進合作。港九培靈研經會，更是如此。所約請的講員，服務的職員，都是來自不同的教會，而能諧和同工，沒有爭執，是不容易的事，也是美好的見證。

不過，在另一方面，合一不是合污。楊牧師注重聖潔，如果有不合真理，違背道德的事，他絕不容忍，不顧情面，立即指明，絕不結合營私，黨同伐異。

儉約而慷慨

楊牧師出身並非富裕，後來在南洋，由從事報業而經商，常有應酬，生活難以檢點；但皈主後，則一改前非，對自己非常節儉，持身甚嚴，從不浪費。先則歷經戰亂，流離播遷，艱苦備嘗；婚後育有勝世，勝魔，勝己三位公子，蓄妻育子，需要極端節約才免於捉襟見肘。及至逃難到香港，所服事的教會，既然沒有宗派，也就沒有制度，對於牧者的敬奉，甚為菲

薄；他又不願師母出外就業，要持家並助理教會，要照顧孩子們讀書，其艱難殊不易想像。而主的僕人，自不是曳裾豪富之門，希求施捨的人；幸賴主的眷顧憐憫，三位公子靠獎學金讀書，並兼作工，都能夠完成學業，長公子勝世，並全職事奉主。不過，所經的道路，是十分刻苦的。

但他對朋友則慷慨，不願因經濟拮据而羞辱主名。香港地居東南亞交通樞紐，來往朋友同工，即使不仰望接濟，也需要招待，所費自然不少。他的兒子們，在香港讀書的時候，午餐所帶的是便宜的餅乾碎。他的西裝，穿到退休十餘年後而不予退休。他每年自美國往香港，主持培靈會，總是自費搭乘三等飛機；幾年前，我勸老人家改乘二等，他應允而不肯實踐；到他九十高齡，我說：“再也不可乘擁擠辛苦的三等票位了。”他應承了。但到回來以後問他，他依然是坐三等如故，而執不肯改。在此之外，楊牧師自早年即致力寫作，成書約四十本之多，除少數有人奉獻印刷費用之外，多數要自己籌措費用出版。華人教會的書，不像洋人可以銷售百萬，收入浩鉅，常需要作者貼補。楊牧師都看作是主的託付，不計收入寥寥，而慷慨奉獻多多。這證明他相信主和主的應許，積財於天，克己的精神可佩，在地上給教會留下相當豐富的智慧財產，真是“雖然死了，仍然說話”。

楊濬哲牧師承受了三位神僕人的“靈統”——像肉身的血統一樣，比長期的效法更深，不是有意的模仿，卻型鑄一個人的性格：在文宣聖工方面，承繼了翟輔民；在培靈方面，承繼了趙柳塘；在教育方面，承繼了劉福群。

如果問：這些不同的性向，怎會統一？這是因為他性情中庸，能夠融會貫通，誠實沒有虛假；絕不是作兩面人，行不顧言，而給華人教會作美好的模楷。

楊濬哲牧師在1912年十一月十日，生於廣東省潮屬饒平縣柘林鄉；於2003年四月十三日凌晨，在美國舊金山寓所離世，到他所愛所事奉七十多年的主那裏，領受他的獎賞。

作者：于中旻
©2025 James C. M. Yu

聖經網
aboutbible.net